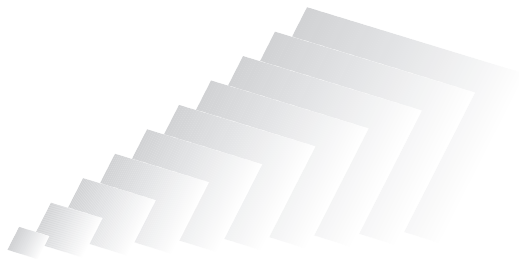


# 本期导读



本刊编辑部

肖华,最年轻的共和国开国上将,1955年授衔时,年仅39岁;王新兰,长征中年龄最小的女红军,1935年长征时,不满11岁。他们是夫妻,相濡以沫,伉俪情深;他们是战友,风雨同舟,患难与共。抗战时期,肖华与王新兰这对革命伉俪在滨海这片大地上,并肩作战,杀倭除寇,书写了他们人生中最为壮丽、也最为辉煌的战斗诗篇。他们在西朱范村留下的帧帧影像,也由此成为永存于连云港人民心中最美、最珍贵的历史画卷。《开国上将肖华和夫人王新兰在西朱范村战斗掠影》一文为您再现这段历史。

我党历来非常重视舆论宣传工作。在抗日战争时期,滨海军区政委、党委书记符竹庭,亲自创立的滨海军区机关报——《民兵报》就是一例。1943年,滨海军区实行党的一元化领导后,符竹庭认为当务之急的头等大事,就是办一张铅印的军区机关报。经符竹庭提议,军区党委决定由年仅23岁的张秋桥负责从部队选调30名干部担任报社编辑、记者,符竹庭亲自约请军旅书法家舒同题写报名。详见祝新华撰写的《符竹庭与滨海军区〈民兵报〉》。

连云港濒临大海,明代的云台山孤悬海上,是淮海大地的前哨,更是倭寇、海贼经常侵扰掳掠的地方。但是云台山的人民历来具有热爱家国、抗拒

外侵、坚贞不屈、勇敢战斗的精神。在海州这片古老的大地上,至今还流传着不少关于当地人民抗击倭寇的故事,还保存着当年与倭寇战斗的遗迹。请跟随张树庄先生《海州抗倭纪略》的笔触,重温云台山人民抗击倭寇的英勇故事。

程开勋,灌南县新安镇人,1905年出生。1934年,跟随方志敏在江西兴德县一带打游击。方志敏牺牲后,程开勋率部向安徽南部转移,建立皖南游击指挥部,自任总指挥,坚持开展武装斗争。抗战爆发后,程开勋返回家乡坚持斗争,后新四军三师敌工部决定由程开勋专做敌伪军工作,成为插入敌人心脏的一名“卧底英雄”,在盐阜区、淮海区立下了不朽功勋。让我们走进韩翠林同志撰写的《卧底英雄程世勋》,感受志士仁人血与火的革命人生。

徐福,是我国历史上有文字记载的东渡扶桑第一人,中日友好交往的始祖。由于史籍记载不详,长期以来史学界许多学者对历史上是否确有徐福其人其事持怀疑的态度。1984年4月,《光明日报》发表罗其湘、汪承恭的论文《秦代东渡日本的徐福故址之发现和考证》,认为赣榆县金山乡徐阜村是徐福故里,引起国内外史学界的关注,并因此再度掀起徐福研究热。那么,徐福其人其事到底存不存在,葛永明先生撰写的《徐福故址之发现与赣榆县建县年代初考》一文帮您解开历史的谜团。

1





## 《连云港史志》编委会

顾问：(以姓氏笔画排列)

古龙高 刘畅征  
许燕臻 杨春生  
李洪甫 张良群  
张学贤 张树庄  
张建民 彭云  
韩世泳

主任：苏中保

副主任：张斌 赵廷旗  
陆瑞萍 魏鹏

委员：(以姓氏笔画排列)

王淙 王滨  
白植明 刘鹏  
邱仕明 张再楼  
陈毅敏 胡卫星  
姜龙才 郝芳  
戚盼德 韩翠林

主编：苏中保

副主编：张斌 赵廷旗  
陆瑞萍 魏鹏

责任编辑：邱仕明 张伟敏  
于冰清

文字总校：张骏鹏

# 目

## 历史与发展

### 04 “与世界现代化名港媲美的港口”

——李先念同志关心连云港港口建设的前前后后(下)

/ 赵鸣

## 党史回眸

### 08 开国上将肖华和夫人王新兰在西朱范村战斗掠影

/ 王晓华

### 11 符竹庭与滨海军区《民兵报》

/ 祝新华

### 13 卧底英雄程开勋

/ 韩翠林

## 史海钩沉

### 16 海州抗倭纪略

/ 张树庄

### 19 海州沈氏家族考

/ 刘成文

### 22 德窥连岛事件始末

/ 李彬

## 往事追忆

### 24 历史的星空

——追寻连云港“知青”的人生轨迹(下) / 毛太奎



# 录

- 27 报社生活琐忆(续一) / 韩世泳  
30 朝阳水库那些事 / 夏天

## 郁洲溯源

- 33 徐福故址之发现与赣榆县建县年代初考 / 葛永明  
35 二疏散金到平山  
——寻古云台十八村之十五 / 伏广喜 闫祥富  
38 黄九堰名称溯源 / 蒋金明

## 地方文化研究

- 41 连云港历史沿革史话(六) / 刘凤桂  
44 试解大伊山石棺墓十大谜团(下) / 黄正明  
47 当路王氏及其他 / 杨春流

## 封二:史志掠影

## 封三:“十二五”期间

## 推动港城经济发展十件大事

纵览历史借古鉴今  
展现风貌追溯渊源  
立足港城洞开窗口  
围绕中心服务大局

地址:连云港市海州区朝阳东路 69 号

邮编:222006

网址:www.lygsz.gov.cn

电子邮箱:Lygshitan@163.com

电话:(0518)85825137 85821368

印刷:连云港市百草园教育印刷有限公司

准印证号:苏新出准印 JS—G033 号

出版日期:2016 年 6 月

2016 年第 3 期总第 105 期

(内部资料 赠阅交流)



# 『与世界现代化名港媲美的港口』

——李先念同志关心连云港港口建设的前前后后(下)

赵鸣

## 三、热议北京

遵照江苏省委和交通部领导的指示精神，建港指挥部组成了以耿杰民同志为首的专门班子，负责起草《关于连云港港口建设问题的汇报提纲》，并四易其稿，最后于1978年6月3日由省革委会副主任周一峰同志审阅定稿。

《汇报提纲》分为三大部分：一是关于连云港港口概况和规划设想；二是连云港建设深水大港的可能性；三是实施步骤和粗略施工计划。

在“港口规划”一节中，除了重申建设西大堤、建设100个左右泊位、达到1亿吨吞吐量的远景规划方案外，提出了“根据国民经济发展需要，今后还可以建设连岛外港区 and 利用车牛山、平山、达捻山等岛屿，建设三四十万吨级油码头”的大胆设想。

在“技术可能性”一节中，重申3次回淤讨论会和几年来工程实践验证所取得的一系列科学结论，测算连云港“深水外航道挖成之后，回淤量不大，每年大约不超过200万方，合计一年的维护土方量在500万方左右，与近期2000万吨吞吐能力相比，是经济的。”《汇报提纲》认为：“随着泊位数不断增多，港内无用水域逐渐缩小，港内淤积量还将减少，经济上的合理性将越来越显著。”

在“实施步骤”一节中，提出了到20世纪末分为四步实现本规划，建成1亿吨规模的深水大港。《汇报提纲》中还提出了：“以港口为依托，建设临海工业区，首先是建设大型钢铁联合企业，还可以考虑海洋石油勘探基地的建设。”

1978年6月6日下午3时，李先念副主席和康世恩副总理的接见和亲自听取港口建设规划的汇报，使连云港建设又上升了一个台阶：决定邀请荷兰专家来协助规划建设。

这次接见历时3小时45分钟。参加接见和汇报的有：国家计委副主任李人俊、金熙英、袁宝华，国家建委吕副主任，铁道部副部长郭维诚，交通部部长叶飞、副部长郭健、陶琦和有关部门负责人。江苏省有省革委会副主任周一峰和连云港建港指挥部总指挥耿杰民和我等5位同志参加。由耿杰民同志为主做了汇报。

会议一开始，李先念同志就问：“连云港工程大不大？”

“土石方工程量比较大。”耿杰民回答。

当汇报到“与世界现代化名港媲美”时，李副主席问：



“行不行？码头干什么用？”

康世恩同志接着说：“物资多了，生产、外贸发展了，都关系到港口。”

李先念同志说：“主要是煤炭，两淮、徐州、山东的煤炭的运输。”

袁宝华同志说：“还有东北的木材，也要走这里。”

康世恩同志说：“再加上搞石油勘探基地，需要大得很哩！”

当汇报到西大堤建设规划时，李先念同志问：“不建在南边，建到东西连岛怎么样？”

郭健回答：“第一期先在南边建，待建一条大堤通到连岛以后，再上连岛建码头，将来还可以向岛的北侧发展。”

李先念同志指着连云港平面图上的海峡西口门说：“建大堤，不把这里切断了么？”

叶飞同志说：“这个大堤比厦门的海堤好建，全部是用石头抛起来的。”

“连云港到处是石头，我赞成用石头。但要注意，开山不要把风景破坏了。”李先念同志说。

“是的，这里还可以搞游览区。”叶飞回答。当汇报建设新浦—墟沟运河，使连云港与盐河、京杭运河沟通，直达长江水网时，李先念同志非常赞成，他高兴地站起来说：“对。这里不只有铁路，将来还要搞运河。29公里长，那容易得很。”接着，他对康世恩同志说：“还有条铁路，从兖州到临沂再到连云港。还有水路，南水北调，没有问题。”

当汇报到建连云港到南京、徐州、西安等地的高速公路时，叶飞同志说：“到郑州、西安再搞一条高速公路，这个港口就太好、太漂亮了！”

当汇报到目前连云港年吞吐量450万吨时，李先念同志说：“太少了！太少了！上海港吞吐量多少？”

郭健同志回答：“6000万吨。”

陶琦同志补充到：“今年计划达到6400万吨。”

李先念同志又问：“鹿特丹吞吐量多少？”

陶琦同志答：“去年是3.6亿，其中油是1亿吨。”

康世恩同志说：“鹿特丹运输的70%是靠莱茵

河疏运，铁路只占30%。我们不会用水。”

李先念同志幽默地说：“中国人变成旱鸭子。”

叶飞同志说：“在世界上，我们老祖宗搞水运是最早的，后代才变成了旱鸭子。”

当汇报到这个港口“大有前途、大有希望”时，李先念同志就问：“我这个话到底行不行？”

陶琦同志说：“是的。连云港建设西大堤后，就形成一个大港湾，长10公里、宽1.53公里，可以布置上百个泊位。”

李先念同志指着自己脐部风趣地说：“我说连云港就在肚脐这位置上，地理位置好，后方疏运条件也很好。不单靠铁路、公路，还有河道。疏通河道花不了多少钱嘛。”

郭健同志说：“江苏人会挖河，已经挖了几十年的河了。”

李先念同志说：“没有这个雄心壮志怎么行！我想在本世纪末能达到1亿吨。”

当汇报到花果山等风景区，可以开发旅游事业时，康世恩同志说：“水帘洞怎么在你们那里，不是在山西吗？”

李先念同志说：“前些时我到泰山去，山东同志讲泰山也有水帘洞。”

王大勇同志（交通部水运规划设计院院长）说：“经过考证，真正的水帘洞是在连云港。”

李先念同志说：“对，东傲来国是靠近海的。这样说来，孙悟空的籍贯应该是连云港了。”

当汇报到连云港建设的关键是“回淤”问题时，李先念同志说：“中心就是这个问题。这个港的泥沙，大体上是黄河古河道曾在苏北入海，就把连云港淤起来了。据证现在没有多少了，但是搞西大堤以后，可能会有变化。”

当汇报到大堤形成后，年回淤量在300万方左右时，先念同志说这个数字不小了。当汇报到连云港航道边坡是1:7，施工基槽是1:4，将来开挖深水航、港池完全可能时，李先念同志说：“要留点余地1:10吧！这么大的工程，总要多点余地，坡度大一点，才站得住。”李先念同志提出：“你们去鹿特丹看看，请他们来个专家组讨论一次。”

叶飞同志说：“我和鹿特丹的市长谈过，他很积极。出去看看，搞大港口我们缺乏经验。日本是个岛



国,他们的经验也不完全适用,像长江口整治他们也提不出办法。”

康世恩同志说:“鹿特丹那么大的港口,欧洲都靠它,他们建港的设备也比较先进,我们搞它一套,要建就要建设一个赶上世界水平的、现代化的港口。”

当汇报到第一期工程大约5亿元时,叶飞同志插话:“5亿怕不够。”

李先念同志说:“我赞成连云港要搞就要搞现代化一点。”

康世恩同志说:“现在建设,不能再去建一个50年代的港口了。”

他又对交通部的同志说:“你们出去考察一下,请鹿特丹来帮助搞一下港口建设规划。”

李先念同志说:“荷兰搞海港是有经验的。他们围海造田的本事也大,筑海堤的办法比我们多。他们国家的土地有四分之一是围海造起来的。”

当汇报到建设规划分四步实施时,先念同志说:“完成两步就不错了,比现在的400万吨神气多了。”

当汇报到1985年前应完成东陇海复线建设时,李先念同志说:“搞复线吧!东陇海复线的任务书已经批了,兖州至连云港铁路已列入计划,要抓紧实施。”

当汇报结束时,李先念同志问:“怎么样,这个港口搞不搞?”

康世恩同志说:“搞总得搞,是迟点搞还是早点搞的问题。”

李先念同志说:“方针要定下来,行不行?计委再找人讨论一下、议论一次。看今天会场上的气氛如何?”他指指周一峰和耿杰民同志说:“他们,不用问了,是积极分子;交通部也不用问,是主张搞的。”康世恩同志说:“都是积极分子。”

叶飞同志说:“我们的意见是搞连云港。”

李先念副主席最后说:“我讲几点。首先是搞不搞,建不建这个港?今天不作决定,但很快要作决定。等余秋里、谷牧、纪登奎同志腾出手来,再议论一次,报中央批准。这么大的工程,要提请中央讨论。我个人意见是倾向要搞,时间可以摆长一点。20世纪究竟发展到什么规模,也可能说得准,也可能

说得不准。”

李先念副主席接着说:“我们现在是旱鸭子,对水运用得不好。这么长的海岸线,前几年‘四人帮’破坏了一下,这几年交通才搞了一点东西。以前是‘帆船交通部’,远洋轮没有。连云港码头不只是为上海服务,还要为浙江、福建、台湾服务。台湾的工业,要给他们运原材料,运粮食,还不简单哩。”

李副主席接着说:“对连云港的建设,我主张请荷兰专家来看一下,提个意见,合理不合理,我们自己会分析,用不用在我。请几位专家来帮助我们搞个规划,出点费用;请荷兰专家来一下,他们搞得多一点,其次是日本人。”

叶飞同志插话:“挪威也提出要帮我们建一个深水港,施工设备他们出,以后他们的船来了优先停靠就可以了。”

李人俊同志说:“要多看看,不要把自己封死了。”李副主席接着说:“回到连云港问题上来。在海底挖一条运河,不简单。我的意见在李人俊同志领导下,请计委找有关单位,还有总参、海军,你们再讨论一次。他们还有什么要求,把报告修改好,从运量算起。不能尽讲好的,不讲坏的,技术可能性如何?要好好分析,出了问题不得了。”他还一再叮嘱:“连云港是个大项目,可不要搞边设计、边施工。”李先念副主席最后说:“情况一定要搞清楚,他们带来的资料图纸很多,计委很好研究一下,抓紧把报告写出来。”他说:“明年开不开工,现在不作决定,技术上一定要落实。”他说:“你们出去看看,请外国专家来,干这么大的工程,过去调查研究不够,经验也不足;外国人的意见,有的还是有用的。”

#### 四、量力而行

遵照李先念副主席的指示精神,1978年6月9日,国家计委副主任李人俊主持召开专门会议,进一步研究连云港港口规划方案和具体实施步骤。参加会议的有国家计委、国家经委、交通部、铁道部、煤炭部、水电部、石油部和总参、海军等有关单位和部门的负责同志,以及江苏省周一峰和耿杰民等同志。

会议进一步听取了周一峰和耿杰民两位同志的汇报,特别是关于回淤研究成果的汇报,并展开了十分热烈的讨论。



这次会议同 1977 年 11 月“北京规划座谈会”相比,可以说是一次更为“务实”的会议。

会议再次肯定了连云港过去几年在科研规划等前期工作方面取得的成果,原则同意连云港港口建设总体规划方案,并根据国民经济综合平衡情况对 1985 年前的建设规模作了调整。

会议讨论中,许多同志认为:港口建设的速度快慢、规模大小,应根据国民经济发展的需求来决定。把连云港建设成为一个现代化的综合性深水大港的目标是肯定的,但是建成的时间是 3 年、5 年、10 年或更长一点时间,要根据货运量的大小来决定。会上对有的同志提出的建设 30 米宽西大堤的设想和建成亿吨大港的期限,许多同志表示了不同的看法。

李人俊副主任说:“连云港的远景非常好,这是肯定的。但是,不能把有限的资金都放在‘远景’那里。西大堤一下上 30 米宽,哪有那么多的施工车辆上去。只讲任务,不考虑经济效益和可能,大量的资金投下去,哪一年发挥作用讲不清楚,资本家也不会干的。”他又说:“港口建设的速度是由货运量来决定的,多大的运量、什么时候需要,然后确定建设的规模和速度。我们搞建设,不是为了好看,李先念同志问我,我说是根据生产发展。”

李副主任极为坦率地说:“连云港要建成一个深水大港,这一点是明确了。但是,由我们还是我们的子孙来完成,得看生产发展的需要和财力的可能来定。”

李人俊指着规划图上的西大堤说:“这条大堤原则上要做,但必须把回淤问题搞清楚,模型试验一定要做,大工程我们吃过亏。天下事只要下功夫,没有做不到的,问题是经济不经济,合理不合理。把西口堵死后,港内流态发生什么变化,现在没有说清楚。一个大工程多少个亿,地质情况没有弄清楚,就搞三通一平,开起工来,一出问题就要停工,这是我们搞基本建设的最大教训。”他恳切地说:“我们都是五六十岁的人了,这点经验要学的,要有革命干劲,还要和科学态度相结合。”

李人俊副主任提出的具体设想是:1985 年连云港达到 2000 万吨的吞吐能力;西大堤分两步走,第一步先起挡浪、防沙的作用,将来再加宽;航

道,第一步先按 3 万吨级,然后再到 5 万吨级,码头建设可以按 5 万吨级设计。庙岭煤炭码头可以先上 2、2、3 万吨级,以后再改为 2、5、5 万吨级。会后,交通部和江苏省革委会根据国家计委专门会议讨论的精神,对原报告作了修改和补充,于 1978 年 6 月 14 日联合向国务院和国家计委上报了《关于连云港港口建设规划的报告》。

《报告》对连云港 1985 年前的建设规模作了调整,把原来提出的达到 5000 万吨吞吐能力的方案作为第二方案,即争取方案。《报告》提出的第一方案是:到 1985 年综合通过能力达到 2000 万吨,其中煤炭 1000 万吨;开辟庙岭新港区及 3—5 万吨级的深水航道;共建成 15 个深水泊位,新增 1600 万吨吞吐能力。

《报告》对近期工程的具体安排是:先建成国家计委已批准建设的 3 个煤炭泊位,码头结构由 2、2、3 万吨级改为 2、5、5 万吨级设计,吞吐能力为 1000 万吨;尔后再建钢铁、木材、集装箱、散粮、杂货等 12 个泊位和 1 个客运泊位,形成 600 万吨能力。西大堤建设也分两步走,先满足挡浪、防沙的要求,顶宽为 10 米,以后再根据需要逐步加宽。

《报告》提出:上述全部工程总投资为 10 亿元。“以上工程完成后,不仅可以加快今后连云港建设的速度,而且由于吹填造陆和其他公用设施的建设,以后泊位造价可以降低。”

在李先念同志的关心和支持下,经过国家各相关部门的多次酝酿和讨论,《关于连云港港口建设规划的报告》得到了认可和批复。今天,连云港年吞吐量突破 2 亿吨,集装箱突破 1000 万标箱,一个现代化的中国名港初具规模。我们回首往事,再忆当年的那段历史,一方面可见当时《报告》科学性和前瞻性;另一方面无不怀念李先念同志对于连云港港口的支持和关心。他对待科学的严谨态度和对工作的务实作风,是我们这些现代连云港的建设者需要学习和永远铭记的!

(作者单位:市文广新局)

责任编辑 邱仕明



# 开国上将肖华和夫人王新兰 在西朱范村战斗掠影

王晓华

肖华，最年轻的共和国开国上将，1955年授衔时，年仅39岁；王新兰，长征中年龄最小的女红军，1935年长征时，不满11岁。他们是夫妻，相濡以沫，伉俪情深；他们是战友，风雨同舟，患难与共。抗战时期，肖华与王新兰这对革命伉俪在滨海这片大地上，并肩作战，抒写了他们人生中最为壮丽、也最为辉煌的战斗诗篇。他们在西朱范村留下的帧帧影像，也由此成为永存于连云港人民心中最美、最珍贵的历史画卷。

## 伉俪情深西朱范

肖华与王新兰相识于陕西省泾阳县云阳镇。

1937年8月25日，中央军委正式发布《关于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的命令》。改编后，原红二师政委肖华被任命为115师政治训处（后恢复为政治部）副主任，主任为罗荣桓。

在云阳镇开会期间，肖华认识了准备去延安学习的王新兰。经罗荣桓介绍，两人确立了恋人关系。之后，王新兰去延安“红大”（即西北抗日红军大学，不久改为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简称“抗大”）学习，肖华则随部队进入抗日前线。

1938年7月下旬，肖华任八路军东进纵队司令兼政委，率部挺进冀鲁边区。10月，部队进行整编，肖华任八路军东进抗日挺进纵队司令兼政委、冀鲁边区军政委员会书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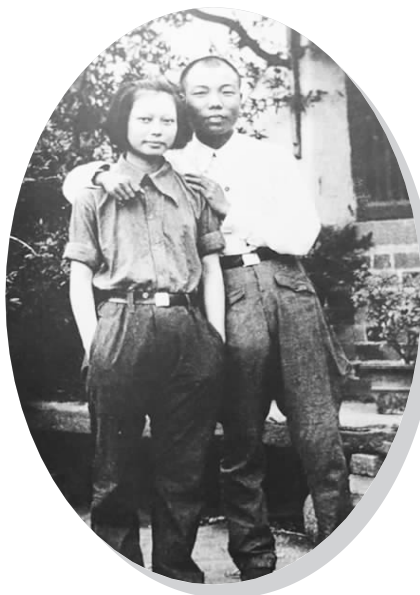
1938年11月21日，已在军委通讯学校毕业

（“抗大”毕业后，转入此学校学习无线电通讯技术）的王新兰，被派往冀鲁边区支援山东工作。因路途遥远、敌伪沿途封锁严密，王新兰到达肖华的司令部所在地前后姜家村时，恰好是1939年的11月21日，历时整整一年。而王新兰此次去山东的艰苦之行，竟跑死了两匹战马。

王新兰到达当天，肖华就给挺进纵队政治部主任符竹庭打电话，请纵队批准他们结婚。批准后，他们也没有举行婚礼，但11月21日，却成为肖华与王新兰心中最甜蜜的纪念日，从此开始了他们同舟共济、执手相依的风雨历程。

1940年夏，肖华与王新兰婚后合影照片（见下图）就诞生于西朱范村。这也是迄今为止发现两人最早的合影照。

时肖华已被任命为115师政治部主任。王新兰则被



1940年夏，肖华与王新兰在西朱范村王家大院合影



任命为 115 师政治部新闻电台台长,常随师政治部活动。师部所在地鲁南青驼寺(现临沂市沂南县青驼镇),与滨海根据地相邻,距时属滨海根据地的临沭县朱樊村(今东海县西朱范村)不远。这一时期,115 师教导 2 旅主力已开辟到鲁南、滨海一带。旅部常驻西朱范、徐班庄、欢墩埠。肖华时常到各旅检查指导工作。这张照片,应该就是肖华到旅部驻地西朱范村检查工作时,与王新兰合影于王家大院。照片为全身立式照,照片中,肖华稍稍后仰左倾,右手轻揽王新兰臂膀,表情略显羞涩;王新兰则双臂长袖挽至上臂,双手置于裤兜,亭亭玉立,神态自然,英姿飒爽。这一历史定格,见证了一对年轻革命家的铮铮铁骨和豪迈柔情。

#### 同舟共济西朱范

1942 年,抗日战争进入最艰难的阶段。3 月 29 日,115 师师部由赣榆县刘福村转移至临沭县西朱范村(今属东海县石梁河镇),一方面进行部队休整,休养生息;一方面为迎接时任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华中局书记、新四军政委的刘少奇同志前来山东检查指导工作做准备。

4 月 10 日,刘少奇在部队的护送下,安全到达西朱范村,入驻在 115 师师部所在地王家大院。肖华负责部分接待刘少奇的工作。新四军军部选派护送刘少奇一行的部队,是新四军独立旅一团(原 115 师教导 5 旅 13 团改编而成),由团长周长胜率领。周长胜完成护

送任务后,决定返回苏北新四军根据地。临行前,周长胜向刘少奇同志辞行。刘少奇除表达了对护送部队战士的感谢之情外,还与山东分局、115 师领导一起与周长胜合影留念。肖华就是其中的一位。这也是抗战时期,刘少奇同志在山东工作期间,惟一的一张合影照。

115 师师部在西朱范村期间,按照中央部署,在山东分局的统一领导下,在山东全省范围内开展整风运动。1942 年 7 月 16 日上午,山东分局在西朱范村王家花园举行“山东整风中心学习组开学”典礼,就此拉开了山东全党整风的帷幕。为统一中心学习组领导,在分局委员会领导下,成立学委会,肖华为五人学委会成员之一。

作为师政治部主任,肖华不仅要具体指导督促全师党员干部整风运动的开展,而且要抓师政治部内部的整风学习。在整风期间,肖华事无巨细,亲力亲为,经常参加师政治部组织的学习活动。肖华与王新兰共同参加小组整风学习的身影(见下图),就



1942 年,肖华(左 4 坐者)与王新兰(右 2)在西朱范村参加整风学习留影



真实再现了他们夫妇当年认真参与整风学习的活动场景。这张照片同时也是 70 多年前全党开展整风运动历史缩影,难能可贵。

### 肖华重返西朱范

时隔两年,肖华又一次来到西朱范村,这一次是陪同奥地利医生罗生特来到设在这里的“平民药房”(滨海医院前身)指导工作的。

1943 年,日伪加大了对滨海、鲁南抗日根据地的封锁、蚕食和“扫荡”力度。置于两个根据地中枢纽地位的临沭县一带,处境则更为艰难。根据地部队官兵、地方武装及平民群众缺衣少食,连基本的生存生活条件都得不到保障。更为严重的是,由于日伪对控制区的封锁盘查,致使我解放区药品器械严重短缺,各种传染病不断爆发蔓延,给当地军民带来重大生命财产损失。为解官兵百姓之倒悬,临沭县委、县政府决定创建一所新型的公办医疗机构。

经过近一年的艰难筹备,这所公办医疗机构于 1944 年 4 月 3 日在西朱范村王家大院内正式成立运营,取名“平民药房”。由于药房药品价格低廉,医生技术精湛,深受当地群众欢迎,在滨海、鲁南一带影响深远。

1944 年 8 月,一直在为罗荣桓治病的奥地利医生罗生特,在肖华、谷牧等人的陪同下,来西朱范“平民药房”指导工作。视察中,肖华对医务人员的忘我工作和无私奉献精神给予充分肯定和极高评价,称他们为广大劳苦大众做了一件了不起的、功德无量的大好事。鼓励他们要像前线将士一样,发扬不怕苦、不怕累、不怕死的精神,克病制难。据时任药房副经理的王如珍回忆:视察后,肖华等一行人与临沭县参议长徐金六、经理王正甫等人合影留念。遗憾的是,这张珍贵的照片至今查无下落。

好在肖华与谷牧、罗生特等人的另一张合影照片被有幸保存了下来。照片拍摄于王家花园。画面中,肖华等四人均打赤臂或短衣短裤,神态悠然,随性面立,让后人见证了一代革命家在战争年代所表现出的乐观与无畏精神。肖华还专门为这张照片取了一个有趣标题,叫“这群怕热的人们”。



1944 年 8 月,肖华(左 2)与罗生特(左 1)、翻译范政(左 3)、谷牧(右 1)在西朱范村王家大院合影

纵观肖华与王新兰留存的影像资料,可以看出,自他们结为革命伴侣后,并肩作战走过许多地方,为后世留下了大量历史照片,但四年之间,在同一个村庄拍摄如此之多的照片,这在他们一生的革命历程中,绝无仅有。这些照片的留世,为研究肖华将军在滨海期间的抗战史提供了极其鲜活的珍贵史料,值得史家关注与重视。

(作者单位:东海县石梁河镇人民政府)

责任编辑 于冰清



# 符竹庭与滨海军区

## 《民兵报》

祝新华

我党历来非常重视舆论宣传工作。在抗日战争时期,滨海军区政委、党委书记符竹庭,亲自创立的滨海军区机关报——《民兵报》就是一例。

### 少奇同志的嘱托萌发办报情

1942年3月18日,时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华中局书记、新四军政委的刘少奇,带着随行的90多人,从阜宁县单家港启程回延安,途中路过滨海区,并遵照中央的指示,指导、帮助山东军民开展抗战。在滨海区的3个多月时间里,刘少奇非常注重宣传工作。曾专门召集山东党政领导及滨海区主要负责同志,多次召开报告会。其中,在朱樊村外的广场上,刘少奇第一次为八路军115师领导机关的全体干部作报告时,要求山东要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手段宣传发动军民团结抗战,特别是滨海区更要依托师机关指挥机构所在地的优势资源,建立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

在大树村期间,刘少奇还单独找符竹庭谈话,嘱咐他办一张自己的报纸,无论对部队还是对当地群众团结抗战,都是十分重要和必要的。符竹庭铭记少奇嘱托,指挥战斗之余,不忘物色人才,谋划办报事宜。

### 罗司令员的关怀催生办报行

1943年春,党中央、中央军委决定山东实行一元化领导。罗荣桓同志成为山东党政军领导的核心,受命担任山东分局书记、115师师长兼政委、山东军区司令员兼政委。山东军区下属的6个军区也都实行了一元化领导。其中,滨海军区是山东领导机关所在地,也是山东军区、115师主力部队所在地。滨海区部队很多,但没有报纸。接到符竹庭同志

的申请后,山东军区司令员罗荣桓同志就打算将军区的报纸、115师机关报——《战士报》(月刊,报名由朱德总司令题写),下放给滨海军区。但符竹庭再三婉拒,只要求师领导机关给他们派干部筹建报社,并指名道姓要张秋桥。

原来,在朱樊村听刘少奇讲话时,符竹庭结识了《战士报》一、四版主编兼记者组组长的张秋桥,因张秋桥在延安时,曾是中宣部速记培训班的高材生,所以,刘少奇来滨海作抗战报告,张秋桥便奉命担任刘少奇讲话记录员。接到符竹庭的申请报告,罗荣桓只好忍痛割爱,动员担任自己多年的秘书、具有丰富办报经验的张秋桥,从《战士报》调任滨海军区政治部机关报《民兵报》,担任报社主编。

符竹庭一边向师部催要专业人才,一边请罗荣桓政委题写报头,并利用滨海军区政治部的人手,于1943年5月20日创刊、发行6开2版的《民兵报》,刚开始,报纸定为周刊,而且都是油印。

### 张秋桥的奉献办出一流报纸

1943年8月,在滨海区的临沭县蛟龙湾举行了115师“八一”大阅兵。张秋桥冒着高温酷暑忍着蚊虫叮咬,实地采访了一个星期,完成了《战士报》的“八一”阅兵专刊后,就来到滨海区负责《民兵报》。

当时的滨海军区实行党的一元化领导后,经符竹庭提议,军区党委决定由年仅23岁的张秋桥负责从部队选调30名干部担任报社编辑、记者,商请同《战士报》共同使用铅印印刷厂。符竹庭亲自约请军旅书法家舒同题写报名。1943年9月,符竹庭将舒同题写的《民兵报》报头亲手交给张秋桥,并嘱咐他一定找人刻好,不要走样。



为刻好报名，张秋桥借来报社通讯员的自行车，清早从赣榆的西北部山区出发，骑行 100 多里路，赶往山东莒南大店，专门请 115 师《战士画报》的负责人那狄帮忙。那狄精于版画，是刀工的行家里手，《战士画报》的编辑部就设在《战士报》的铅印厂。那狄见到风尘仆仆的张秋桥，大为感动，连夜动手将“民兵”两字完美无缺地刻了出来。第二天一早，张秋桥顾不上休息，骑上自行车往回赶。

很快，面貌一新的《民兵报》，在出版 6 期后即改为铅印再次与大家见面，并受到部队干部战士的热情欢迎和大力支持，许多同志积极投稿，还有不少人来信提出对报纸的改进意见。张秋桥与报社的同志认真贯彻符竹庭政委“全军办报”的方针，先后发展通讯员 1000 多名，并在报纸上开辟了“望远镜”“红榜”“劝化院”“回头路”“俱乐部”“工农干部习作”“战士园地”等十几个专栏，优先选用通讯员的稿件。因报纸办到战士的心坎上，还多次受到中共中央山东分局、山东军区的表彰。

有一天，符竹庭从山东军区开会回来，很高兴地对张秋桥说：“罗政委和肖主任都赞扬了《民兵报》，指示要增加发行份数，要保证 115 师机关及边远和分散的小单位都能看到。”并特别赞扬了张秋桥的奉献精神。

1944 年 1 月，《民兵报》又改为 4 开 4 版，5 日刊，每期发行量也增加到近 4000 份。1944 年秋，张秋桥又奉命前往鲁南军区，负责创建《前进报》并任社长，后任《津浦前线报》社长、鲁中南军区宣传部长兼《前卫报》社长等职。

张秋桥在《民兵报》虽只工作了一年，但却是最为繁忙和紧张的一年。他多次进行战地采访，尤其是采访了战斗英雄何万祥和“朱德神射手”侯殿经，目睹了许许多多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特别是符竹庭将军的英雄风采和壮烈牺牲，让他终身难忘。他在名为《但求屹立天地间》的回忆录中，作了很详细的叙述。

1948 年 1 月 15 日，《民兵报》全面停刊。

#### 将军英灵千秋报纸专刊祭奠

1943 年 11 月 19 日，符竹庭和滨海区司令员陈士榘共同制定了“军事打击、政治争取、里应外合、全歼敌人”的战斗部署，攻打赣榆城。卓有成效

地开展瓦解伪军的工作，利用内线打开城门，并随同突击部队在前沿指挥作战，全歼伪和平建国军第 71 旅、伪保安队和盐警共 2000 余人，从伪旅长到伙夫无一漏网。

受到沉重打击的日本侵略者，不甘心必然灭亡的命运。赣榆战役后，便纠集各地的日伪军对我根据地采取报复性“扫荡”。11 月 26 日凌晨，日伪军乘大雾偷袭滨海军区所驻之吴山区马旦头村，符竹庭在指挥警卫部队很快将敌人火力压制住，返回军区途中，因所骑战马受惊狂奔，被摔下马来，头部遭受致命创伤，虽经罗政委派来的奥地利专家罗生特全力抢救，仍不幸殉国，年仅 31 岁。

作为《民兵报》主编的张秋桥，当天一直在马旦头村的树林里，与滨海军区机关的同志一起，等待军区政治部主任刘西元传来抢救符政委的消息。噩耗传来，张秋桥悲痛欲绝。为沉痛悼念符竹庭政委，《民兵报》出版了专刊，报道了滨海军民沉痛哀悼符政委的活动，刊登了干部战士撰写的悼念文章，还专门刊登了报社编辑部的悼念专文。当张秋桥将《民兵报》的悼念专文送给罗荣桓政委审阅时，罗政委惋惜地说：“符竹庭同志是红小鬼成长起来的，是对党和人民赤胆忠心、军政兼优的优秀干部。他风华正茂，才 30 岁多一点就牺牲了，太令人痛惜啦！”一向坚强镇定的罗荣桓政委竟潜然泪下……

就这样，《民兵报》用一个专刊，向关心、爱护、鼓舞、支持报纸成长壮大的符竹庭政委挥泪告别。2002 年，已离休多年的张秋桥，再次拿起笔，写下《永远不会忘记——怀念符竹庭首长》的纪念文章。

张秋桥，张春桥的亲弟弟，1937 年 12 月投奔延安，在陕北公学学习。1938 年 3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39 年冬，调任 115 师司令部任参谋、罗荣桓秘书。1943 年 9 月，负责创建滨海军区机关报，并任《民兵报》主编。新中国成立后，调任中央军委《八一杂志》社副总编辑，后任《解放军报》记者处长。1955 年他被授予上校军衔，荣获三级独立自由勋章和二级解放勋章。1963 年升任《解放军报》副总编辑、社党委第一副书记。2010 年 11 月，因病逝世，享年 90 岁。

（作者单位：赣榆区政协）

责任编辑 于冰清



# 卧底英雄程开勋

韩翠林

## 少小离家乡 投身革命意志弥坚

程开勋,又名伯篪,1905年出生于新集镇四牌里一个市民家庭,后迁入现新集镇北洋村。他自幼聪明好学,熟读诗词歌赋,喜爱琴棋书画。17岁时,说服父母,离开家乡,到外面去寻求真理。

1922年,他不顾旅途劳顿,先到东三省,遇到两位俄国共产党人,接受了进步思想的熏陶。后又去南京东南大学,找到学生会主席、共产党人宛希俨,宛给他写了一封推荐信,让他去江西赣北、赣中和湖北黄冈、黄梅等地找王绍之、商谓书、石钟衡三位共产党员。取得联系后,程开勋便在他们的领导下投身革命。

1926年,程开勋的二哥突然病逝。他闻讯回家为二哥办理丧事,不料,被国民党涟水县警察局知道,县保安团的一个连,半夜把程开勋家围堵起来。程开勋发觉后,历经艰险,终突出重围,安全回到江西。

1934年,程开勋跟随方志敏同志在江西兴德县一带打游击。1935年8月,方志敏因叛徒出卖牺牲,程开勋率部向安徽南部转移,在皖南重新集聚流散人员,建立了皖南游击指挥部,自任总指挥,坚持开展武装斗争。后在敌人的重重围剿下,游击队再次被打散。1939年初,程开勋独自返回涟水。

## 深入敌虎穴 心细胆大智斗日伪

回到家乡后,程开勋很快与地下党的一些老同

志——薛步乾、殷如航、薛卫五、薛会友等取得联系,并和他们一起在家乡继续战斗。

1939年3月,日军相继从堆沟港、陈家港一带登陆。不久,从连云港到涟水城盐河线上的大小城镇,被日军全部占领了。

1940年8月,八路军山东纵队陇海南进游击支队南下,随后黄克诚率领八路军五纵队也南下,分别建立了盐阜五分区、淮海六分区和各县、区、乡民主政府。因战争的需要,新四军三师敌工部决定由程开勋专做敌伪军工作。接受新的任务后,程开勋很快便与日伪军拉上关系,并在涟水的五港建立一个伪组织——维持会,组建一支百余人的队伍。由程开勋任队长,把时码到新集镇盐河一线上的大小据点,都纳入他的势力范围之内。特别是钦工、蔡工两个渡口,这是盐阜、淮海两军分区一切交往活动的咽喉要道,保证这个通道万无一失的重任,就落在程开勋的肩上。

驻五港的日军,为了和涟水城日军司令部保持密切联系,多次要接通从五港到鲁渡9公里的电话线路,总是白天接,夜间就被程开勋派人拉掉,日军因始终无法接通而不了了之。

1942年春,新四军某连当连长的程一伍,化装成老百姓回老家——五港街探亲,刚到街上,迎面开来一辆日军军车,挡住他的去路。从车上跳下来几个日本兵,手持上了刺刀的枪对着他说:“你的毛猴子!”程一伍一时不知所措。恰好被站在炮楼上的程开勋看到,他认识程一伍,立即从楼上跑下来,当



着日军的面大喊道：“你昨天来当兵，今天上街闯什么魂呀！”转脸又对日兵道：“他的，我的兵，大大的良民！”日本兵指着程一伍便衣下的新四军军衣说：“他的那军衣？”程开勋道：“哦！那是他打八路得来的。”日兵竖起大拇指，哈哈大笑道：“你的，大大的好！”程开勋随即从口袋里掏出香烟，发给在场日军每人一支，日军接烟后“哟西、哟西”地上车走了。程开勋便把程一伍带回了家。

有一天，从山东来了一个送机密信件去东坎的地下交通员，刚到盐河边的蔡工渡口，便被日伪军抓住押送到程开勋面前，程开勋一见，便哈哈大笑：“你们怎么把我表弟抓来了？他叫林德，是个穷光蛋，你们抓他干什么？”交通员听他这样一说，也顺水推舟说：“表哥，我是去东坎做小生意的，你全家都好吗？”程开勋道：“还好！”随即从身上掏出两块大洋，说：“表弟，这两块钱给你上路买点茶喝。下次再来，到我这里玩玩！”交通员谢他而去。其实，他不叫林德，谁也不知道。

1942年，新四军二师师长罗炳辉去延安学习，路过五港。程开勋严密的组织警卫，亲自带人用大木桶从蔡工渡口把罗师长送过盐河，安全到达延安。事后罗师长还和程开勋通了7次信，对此事给予高度赞扬并深表谢意。

1942年冬，日伪军对盐阜、淮海地区进行梳篦式“扫荡”，到处据点林立。我军化整为零，开展游击战争，打击敌人。机关、学校一切非战斗人员，全部疏散，各找门路打埋伏（隐蔽在群众当中）。灌东的孙婉如、封林、李素云三位女同志结伴，通过关系由程开勋介绍到花园孙老庄孙大坎家住下。孙是富甲一方的大地主，又是安清帮大字辈的老太爷，附近日伪的大小头目和他都有关系。国民党涟水县政府的县长朱梦杰，不仅是他的表侄，而且手下的那些喽啰，都是他的徒子徒孙。袁闸、孙湾就是这些人出没的窝巢，他是当时这个地方势力很大的老太爷。这三位女同志住在他家，自然十分安全。

有一次，华野敌工部有一封重要密信，派两名小交通员送给程开勋。两个小交通员走错了路，一头闯进时码王培坤的据点，被王培坤的伪军从马上拉下来，搜查审问，两个小交通员情急，把密信塞入

口内吞下。王培坤气得大发雷霆，严刑拷打，他俩却只字未说。我敌工内线迅速把情况传送到敌工部，敌工部又另派人送信，经涟东小埧苏北行署政治处杨纯主任处，方才送达五港程开勋手中。程得知两个小交通员事情后，立即派人去时码请王培坤来作客。王培坤到五港下得马来，见了程开勋，抱拳拱手笑着道：“兄台，我带给你两件礼物，作为你我今天下酒菜。”程开勋一看是两个小交通员，当然心知肚明，便道：“这是怎么回事啊？”王培坤把缘由说了一遍，便抚掌哈哈大笑。程开勋转脸对警卫道：“快把这两人关起来看好，晚上我要好好审问他们！”程开勋三请两让地把王培坤邀进客厅入席，把酒畅叙，直到酒足饭饱，王培坤才带着护卫上马扬长而去。

晚饭后，程开勋通知部下拿着锹锄到五港街北旷野地里挖了两个坑，言夜里要把两个交通员在那里活埋。到半夜就叫人把两个小交通员绑起来，把马鞍解下，挂在他们的脖子上，程开勋亲自带着6个警卫人员，牵着马来五港街王巷，从小交通员脖子上取下马鞍放到马背上，让他们骑上马，出五港，经乔荡，直奔涟东小埧而去。两个小交通员顺利到达杨纯主任处，并向她汇报了有关问题和整个情况。

1945年5月，程开勋带着百余人的队伍从五港进驻到大新集，编入王延谋部。新四军五港敌工站的朱贞很快和他取得联系，制定了奇袭大新集日军据点的计划。5月中旬的一天夜里，程开勋率部从大新集据点内部接应，涟东县总队从外围进攻，一声军号，便对日军据点发起猛烈进攻，一时枪声大作，爆破声、手榴弹声混成一片，震动旷野。程开勋率部配合涟东县总队全歼新集据点日军，而一时震撼周边县区及盐河一线所有敌伪据点的日伪军。后来，程开勋率部参加了涟东总队，活跃在涟东大地上。1945年8月，程开勋被调往12纵队86团，1947年夏，由于工作需要，程开勋又被派往敌工部从事隐蔽工作。

### 解放新安镇 英勇献身名垂青史

1947年9月12日，人民解放军在南线东起苏北，西至陕西，南抵长江，转入对国民党全面进攻。



华野决定 11、12 两纵队,向淮海六分区的新安镇、五里庄、丁集等处对敌军整编 44 师(原伪军徐承德队伍)发起进攻。第 11 纵队主攻新安镇、武障河据点,打开我主力部队西进的大门。

程开勋为了弄清新安镇的敌情,先后派出周法启、孙如超等人打入新安镇还乡团内部,进行策反活动,也结交了一些人,如四十四师的赵排长和国军赵云山连长,但活动都很不得力。程开勋心急如焚,无奈之下,他主动向领导提出由他直接打入新安镇敌人内部去开展工作。

程开勋通过涟水内线的关系打进了驻新安镇国民党营长王希畴的营部,经王希畴介绍,和各连、各还乡团的头头见了面。这样,他在镇上随便走动就很方便了。经过一段时间了解,程开勋把新安镇地形工事、各连队的装备、人数分布状况及各指挥员的素质,都作了一个极其详细的报告,交由内线送往华野敌工部。很快得到敌工部的回音说:已下达命令 11 纵队 31 旅主攻新安镇,91 团围攻新安镇北门,92 团围攻新安镇南门,93 团围攻武障河据点和沿武障河岸布防围点、打击大伊山国民党援兵。32 旅在顺河集、郑庄一线作后援,于 1947 年 10 月 15 日全部进入阵地。

程开勋得到消息后,立即到新安镇东门魁星阁据点,向内线周法启、赵排长和南门孙如超等人传递有关情况,要他们把可靠的人团结在自己身边,一旦解放军接近圩门,要他们见机行事,并约定届时军帽倒戴,打开圩门,臂扎白毛巾迎接解放军进圩门,便可平安无事。随后他又到石头路西门,做了周详的安排,最后才来到安插在国军内部的周云山的连部。周是本地人,程开勋很了解他,便对他说:“云山啊,你是本地人,现在已经到了生死的最后关头,你要立功赎罪,你要特别提高警惕,机动灵活,可派一个班去保护档案室,别的集中力量保护军械库,能做到这点就是立了大功。”事后,程开勋又来到国民党四乡联防主任孙奇杰的办公室说:“奇杰啊!你和我乡里乡亲,过去你做过一些好事,也得罪过一些人,现在战争已经到了生死的最后关头,解放军是不计前嫌的,只要能立功便可赎罪。你知道吗?”孙奇杰道:“这我知道,你说怎么

办?”程开勋道:“你是我同乡,我跟你说实话,我们的敌人,不是共产党、解放军,是国民党的军队。现在解放军大军压境,跟王希畴的队伍跑,那只能是死路一条,怎么办?在最后关头,你必须率精干武装适时活捉王希畴,我会给你报功的,其次你需派百余人,听我指挥到镇北峙云门去,见机行事。”孙奇杰道:“可以。”

1947 年 10 月 16 日前半夜,进攻新安镇的 91 团 1 营进入峙云门外头排大街后,便立即向峙云门守敌发起猛烈的进攻。峙云门上的守敌,是敌机炮连王排长率一个排固守,凭着这座碉堡式的峙云门,居高临下,有两挺重机枪,十挺歪把轻机枪和迫击炮的优势武装力量,可以控制整个头牌大街和左右数百米的圩壕。程开勋看到我军在峙云门外头牌大街,虽然有猛烈的炮火攻击,但却寸步难行,大街上到处有死伤的战士。他看在眼里,恨在心头,手提盒枪,身先士卒,直奔敌军王排长,向所带的人大喊一声:“弟兄们!给我狠狠地打!”一时峙云门上下乱成一团,互相拼杀起来。混战中,程开勋连中数弹,倒在血泊之中,为解放新安镇献出他 42 岁的年轻生命,长眠于灌南县烈士陵园。

如今,虽然战争的硝烟已经远离我们,但我们对于先辈的追忆,却从未停止过。在灌南日新月异发展的今天,我们特别怀念像程开勋这样的志士,他们用生命热血,浸染着锦绣的海西大地,谱写出壮丽的优美乐章。他们用鲜血和生命铸就的巍巍丰碑,与日月同辉。

(作者系中共灌南县委党史办主任)

责任编辑 于冰清



# 海州抗倭纪略

张树庄

连云港东临大海,明代云台山孤悬海上,是淮海大地的前哨,更是倭寇、海贼经常侵扰掳掠的地方。但是云台山人民历来具有热爱家国、抗拒外侵、坚贞不屈、勇敢战斗的精神。在海州这片古老的大地上,至今还流传着不少关于当地人民抗击倭寇的故事,还保存着当年与倭寇战斗的遗迹。

十四世纪初,日本进入南北朝分裂时期,封建诸侯割据,互相攻战,争权夺利。在战争中失败了一些南朝封建主,就组织武士、商人和浪人到中国沿海地区进行武装走私和抢劫烧杀的海盗活动,历史上称之为“倭寇”。明初开始,倭寇对中国沿海进行侵扰,从辽东、山东到广东漫长的海岸线上,到处剽掠,沿海居民深受其害,海州人民一样受到倭寇的伤害。

面对严重的海防形势,海州官民一心,重视加强海防,建筑防御工事,以御倭寇。《隆庆海州志·卷一·舆图》记载:明洪武二十三年,淮安卫在海州分设中前千户所,由千户魏玉等守护,并在西城故址修筑土城。到永乐十六年,千户殷轼在土城上砌以砖石,高二丈五尺,周围九里一百三十步。又在城西设水关,池深六尺,建吊桥三座,设在东、西、北门外。

《隆庆海州志·卷四·治典·武署》记载:在海州设守御东海千户所,千户所位于东海城(今南城)十字街东,洪武十七年,千户黄寿创置。千户所下设营寨,洪武二十六年,守御千户杨从益开创墟沟城营寨和宿城营寨。东海西石岛(今西墅)去东海城八十里。山高险,南、西、北三面环海,东接舍利山(今北固山)。认为这里:“凡舟往来,舡以伺风信;控制海道,实为要地。”洪武六年,淮安卫委官统兵泊舟于西石岛守备。嘉靖元年,守备指挥张柱在海州建立守备公署一所。《隆庆海州志》的编纂者张峰对该目内容作这样的评述:国家在这里建立东、西海二所,统以备倭指挥,添设东海把总,难道不是因为濒临沧海,连接齐鲁,而为淮安的北门吗?

陈宣《州志》记载:明洪武中,因海警,于淮安卫八所内拨中所守御海州之东,中前所守御海州之西。凡州境沿海十三口及陆路要害处,俱由所军分守,听所官领导。

《嘉庆海州直隶州志·卷二十·海防》载有清刘兆隆《东西守御二所并屯田纪略》,文中写道:之所以设立东





北山黄石嘴炮台遗址

黄石嘴炮台遗址

西二所,是因为州城逼处海边,东海(指以南城为中心的南、中、北云台山)又孤悬海岛,地方辽阔。明代洪武年间,倭寇与海贼交讐,因此于淮安卫八所内,分中所守御海州之东,中前所守御海州之西。东所有南城和北城两座城池,沿海设十四座烟墩,后增筑四座烟墩,共十八座烟墩。西所有州治、门禁、仓库等重要设施。沿海十三座烟墩,后增筑三座烟墩,共十六座烟墩,分军防守。明代设立的抗倭烟墩遗址至今犹存,有桅尖山烟墩、南固山烟墩、墟沟西南山烟墩、北固山黄石嘴烟墩、宿城炮台顶烟墩等。

海州是倭寇经常袭扰的地方。这里流传着不少军民抗倭的动人故事。最早的记录是《隆庆海州志·卷八·杂志》,“海洋龙王庙:在墟沟。其神屡有灵异。洪武四年,倭寇奄至,居民惊惧,请祷于神,及旦,寇乃大溃,追杀俘之。或问其故,曰:‘见兵甲旗帜弥山而来,故遁。’乃知神之佑也。”这则故事,实际上记述了墟沟官兵抗击倭寇的一则真实故事,只是假托龙王灵异罢了。

《嘉庆海州直隶州志·卷二十二·良吏四·将弁》中写到海州的一位抗倭将领——殷弑。殷弑,原籍

河南光州人。洪武间授武略将军、守御海州中前千户所,世袭副千户。建立西城,至为巩固。厥后倭寇犯境,依城捍贼,咸推弑为远猷。

《隆庆海州志·卷八·杂志》中写到东陲山有六勇祠,海州通判范永官报祀征倭阵亡陈升等六人。《嘉庆海州直隶州志·卷十九·祠宇》:“六勇祠:陈宣《州志》在东陲山,通判范永官报祀征倭阵亡陈升等六人。明季倭寇肆虐,勇士敌忾,奋不顾身,报以芟莫,虽秩典无文,而义魄为雄,不可废也。”东陲山顶还有一座三义祠,这里祀奉的

是海州周淇等三人。《嘉庆海州直隶州志·卷二十四·人物》:“周淇:字海濒,海州人。有胆略,善骑射,以细瓷末实甲。万历(1573~1620)间,有倭警,州牧征淇御之,有功,后与乡饮宾,以寿终。州人祀于东陲山之西滩,名三义祠。”

《连云一瞥》的作者许绍蘧在编写该书的时候,曾专门到东陲山采风,并写了一首《东陲山访三义、六勇祠》的长诗,摘要录此,以飨读者:

灌邑嘉隆倭屡寇,民不知兵不敢斗。  
海中游戈听诛求,守望相助防困兽。  
前有三义真奇才,以逸待劳潜蒿莱。  
贼舟泊岸立未定,大呼杀贼声如雷。  
后有六勇亦壮哉,风云叱咤惊尘埃!  
碧血溅草气犹怒,倭人胆裂心如灰。  
乡人食德思报德,紺宇琳宫映山色。  
采苹采藻岁不休,为酬当年杀悍贼。  
典秩无文心力诚,毅魄联翩享血食。  
……

忠魂日暮松楸哭,点点鬼灯红道周。  
往事已非那可说,一腔热血洒千秋。



假令昔贤今尚在,执鞭欣慕志亦酬。

除地方志书上的记载外,当地百姓间还流传着不少当地群众抗击倭寇的英勇故事。甚至还有戚继光来海州打倭寇,立“防倭寇”碑的故事。

高公岛海边,原有一座龙王庙,庙旁曾立有一块石碑,上书“防倭寇”3字,1939年被侵华日军砸毁。这块碑传说为抗倭名将戚继光所立。

云台山一带被倭寇侵扰非止一日,倭寇想把这块地方变成他们打劫北方的基地。嘉靖三十年(1551年),盘踞在北云台山的倭寇打算北犯登州。这消息传到了戚继光的大帐中,戚继光立即组建了一支军队约3000人,南下准备云台山清剿倭寇。住在高公岛和宿城一带的倭寇北上还没准备好,忽然听到这个消息,顿时慌了手脚。

时隔不久,戚继光带着三千人马来了,部队就埋伏在宿城东崖屋的小山头上,只等盘踞在高公岛上的倭寇前来决战。倭寇们认为戚家军立足未稳,有机可乘,百只船在倭酋和汪栋的带领下,向戚家军营地扑来,谁知刚刚到东崖屋海面,埋伏在湾里的戚家军战船便一齐冲了出来,把几千名倭寇杀得片甲不留。

经过这场战斗,驻在云台的倭患武装就全解除了。戚家军在高公岛的龙王庙前举行了祝捷大会,还特地奖励了地方上参与抗倭的民众。戚家军将活捉到的倭寇全数斩首示众,并竖了一块“防倭寇”的碑,作为永久纪念。

到了387年后的1938年3月的一天,侵华日军进攻黄窝,烧房子,杀民众,受到了当地驻军的顽强抵抗。1938年5月20日,日寇从连云港孙家山登陆,突破了第八军曾锡珪的防线,占据了连云港。1939年2月28日,守军撤退,日寇占领了连云港及云台山大桅尖。1939年3月4日,日寇占领墟沟,至此整个连云市沦陷。但是,连云市的人民是不屈的,尤其是当地晚清的秀才们。他们不愿为日本鬼子做事,闭门不出,大多以教书为业。日本鬼子既恨他们,又拿他们没办法,就想出了一个毒计,想借机给这些老秀才们一个下马威。想让这些秀才们来

解释“防倭寇”碑上文字的意思,以便借机整整这些老人。

1939年秋的一天,几个日本鬼子分别来到新县和墟沟的老秀才家中,毕恭毕敬地递上请帖,请这些老秀才去高公岛,这些老秀才也想知道鬼子葫芦里装的什么药,于是答应了。一起来的有新县的张学瀚(字百川)、张恩沛(字云书)、张正荣(字介休)、张效天、张谷元、李斯,及墟沟的老秀才邵会林和其子邵静波。

车子开到高公岛海边龙王庙那儿,众秀才从车上下来,被引到海边的一座石碑前。一个军官模样的日本鬼子挎着大洋刀,凶神般地站在那儿,汉奸市长陶惠甫站在旁边,算是在迎接。接着翻译指着石碑说道:“皇军特地请你们几位鸿儒来看看这块碑,并把它解释一下。”这些老秀才们一齐看那块碑,碑有一人高,当中正楷“防倭寇”三个大字。这时,那个鬼子军官指着这三个字问是什么意思,众秀才你望望我,我望望你,明知说不好是要被杀头的。海边风大浪急,海浪撞击在礁岩上呼呼作响,喷珠溅玉。正在这时,只见一位老秀才走了出来,他就是《云台导游诗钞》的作者,晚清秀才,贡生,新县的张百川。只见老人家走到碑前仔细地端详了一阵说道:“倭者,矮人也。《汉书·地理志》有云:‘乐浪海中有倭人,分为百余国’。有注云:‘倭在带方东南大海中,依山岛为国,度海千里,复有国皆倭种。’倭人身材矮小,时常侵扰我国沿海一带,横行无忌,劫掠财物,屠戮居民。明朝抗倭名将戚继光曾派兵灭倭寇于此,故立是碑。”鬼子没有难倒这些秀才,他们的如意算盘落空了,只得把众秀才又送回到家里。众秀才刚刚离开高公岛,日本鬼子就把这块“防倭寇”的石碑给砸了,但是中国人民抗日的这颗心却是永远也砸不烂的!

(作者单位:连云区地方志办公室)

责任编辑 于冰清



# 海州沈氏家族考

刘成文



沈雨人侍郎小照

近日,我从沈氏后人沈耀飞处得阅《吴兴堂沈氏迁海支谱》,里面保存有清乾隆五十七年(1792)沈氏从浙江湖州迁到海州地区后的第六代沈方恒撰写的《沈氏家族草谱》(以下简称《草谱》),以及1912年第十三代沈采臣亲笔书写的《沈氏迁海家谱》(以下简称《家谱》)。从珍贵的《草谱》、《家谱》中可以清晰地整理出沈云沛家族在海州地区的繁衍过程。

## 沈氏家族的由来

1912年秋天,沈采臣根据祖辈沈方恒的《草谱》重新进行回忆整理,他在《家谱》序言中这样写道:“根本固则枝叶茂,九族睦则六亲和。故关雎裕后,庆螽斯之蛰蛰;雅诵光前,咏瓜瓞之绵绵。至于诗咏渭阳,舅氏之族当尊;慎选东床,外甥犹称宅相。此古先圣所以立三纲而正五常者也。我族系派演西伯,根蟠南国,堂称‘和壹’,郡号吴兴。及繁衍东灌,垂三百余年,支派既多,迁止各异,间有孙重祖讳,穆犯昭名者,亦复不少,皆缘名义未能宗一耳。族叔雨辰公(即沈云沛,笔者注),富贵双兼,几经请求,未蒙□(缺字,笔者注)此,终成恨事。今谨遵先祖次咸公之遗墨,作为本根纵支,发万年可知原源之所在。”

从《家谱》序言中看出,沈氏起源于西周初期分封的姬姓诸侯国,因有一支被封在沈子国,子孙就以国为姓,这就是沈氏的来源。东汉汉光武帝时期,九江从事沈戎徙居到会稽乌程(今浙江省吴兴区南)。后来,吴兴沈氏累世官宦,遂发展成为名门巨族。自东汉至隋代,沈姓名人基本上都出自吴兴武康(今浙江省德清县武康镇)。南朝文学家沈约、宋朝科学家沈括、清朝文学家沈德潜、以及现代文学家沈雁冰(即茅盾)都出自吴兴沈氏。故有“天下沈氏出吴兴”之称。

沈姓是中国的第三十七大姓。当代沈姓的人口已达600多万,大约占全国人口的0.5%。“吴兴堂”为沈姓总堂号,也是郡望。迁居全国各地的沈氏一般还有自己的分堂号,比如湖南澧县沈氏的“清正堂”,无锡沈氏的“复初堂”,常州武进沈氏的“志远





沈采臣亲笔书写的《家谱》序言

堂”，海州沈氏为“和壹堂”。全国各地的沈氏分堂号还有“梦溪堂”“光裕堂”“承裕堂”“忠义堂”等。沈云沛应该是“和壹堂”的后人。

#### 沈氏家族迁居到海州地区

明朝万历年间(1573—1620)，浙江吴兴县人沈镇钦迁居海州南部灌云、灌南一带，他是沈氏家族的迁海始祖。沈镇钦原来居住在今天的湖州市吴兴区(古称归安县)。

沈镇钦为什么要迁到海州地区来？这里有经济因素，也有地理因素。

经济因素是明朝中叶实行的“中盐法”，也就是将全国的产盐地区分为六个都转运盐使司，每个都转运盐使司都控制着一个主要的产区。六个都转运盐使司是两淮、两浙、长芦、山东、福建以及河东。在所有产盐地区中，两淮都转运盐使司处于最为重要的地位，《两淮盐法志》称：“盐商夙号殷富，而两淮尤甲天下。当乾隆盛时，凡有大工大役，靡不输将巨款。”明代以善于理财而知名的监察御史庞尚鹏在奏折中写道：“两淮煮海为盐，岁课甲天下，九边之供亿实赖之。”在整个明代，大体上，两淮盐课占全

国盐课收入的一半左右。根据明万历八年(1578)的一个统计，全国的盐课收入为129万两白银，而两淮独占60万两，占到50%左右。海州地区是两淮盐业的重要产区，经济的繁荣，带来的是外来人口的增加。当时大量的安徽、浙江商人来此经营与盐业相关的产业，并就地定居。灌南县县城新安镇就是因此而发展起来的。

沈家迁海的另一个原因是黄河夺淮入海。根据史料记载，黄河曾数次侵夺淮河流域。在明万历年间，黄河就曾经决口18次。黄河的侵淮入海，使得淮河流域的水系发生了重大变化。特别是黄河南侵带来大量泥沙淤积，逐渐形成了大片陆地，引来了移民前来开垦。明朝政府为了安抚新到移民，对移民提供农具粮种，并实施免税政策。包括灌南新安镇等一大片淤泥积成的土地上有大批南方过来的新的民众，他们都在此繁衍、生活。

沈云沛祖先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迁居海州地区的。他们与传说中的“洪武赶散”(又称为“红巾赶散”“红绳赶散”)无关。因为沈家迁海已经在万历年间，距洪武年间(1368—1398)已经有二三百之久。另一个确凿证据是迁海始祖沈镇钦共生了五个儿子，即沈得春、沈得诏、沈得宽、沈得时、沈得英。只有长子沈得春在海州地区生活，另外四个儿子留在原籍没有过来，并且沈镇钦去世以后自己也归葬吴兴原籍。如果是强制性、报复性的“洪武赶散”，那是不可能做到的。

#### 沈云沛家族在海州地区的发展

沈云沛这一支系的繁衍发展在《家谱》上历历在目。沈云沛是沈氏迁到海州地区后的第十一代。

沈氏迁海始祖沈镇钦长子沈得春生三子，分别为沈继祖、沈继宗、沈继业。

沈继祖生一子，名沈思贤，与夫人合葬在今天灌南县张店南的王家庄。

沈思贤生二子，分别为沈凤翔、沈凤翱。沈凤翱葬于锦屏山下的石家凹。由此可以看出，从沈氏迁海第五代沈凤翱开始，沈家迁到了海州古城内生活。

沈凤翱生五子，分别为沈维垣、沈维屏、沈维翰、沈维范、沈维城。沈维垣葬于锦屏山下的石家凹



祖茔内。沈维屏葬于海州青龙涧。

沈维屏生四子,分别为沈二酉、沈三重、沈四德、沈五常。

沈五常生三子,分别为沈光奎、沈光道、沈光表。沈光道无子,因此沈光奎的儿子沈士杰过继给他。沈士杰就是沈云沛的祖父。

沈云沛考中进士后,要向当时的光绪帝呈奏科考功名及家族身世,他是这样写的:“曾祖光道,不仕,故。本生曾祖光奎,不仕,故。祖士杰,不仕,故。父观国,不仕,故……”

可以看出,沈云沛的曾祖父是沈光奎,祖父沈士杰过继给了沈光道,因此他对外称自己是沈光道的后代。如民国8年(1919),吴廷燮撰写的《沈云沛墓志铭》中写道:“公谓云沛,字雨人,江苏东海人也。曾祖光道,祖士杰……”

清光绪丙申年(1896)出版,灌南人相才撰写的《胸阳纪略》中有沈云沛父亲沈观国的简历:“观国先生字利宾,西门恩贡。古取入学补廪。家塾设教,董书院,办充公学田,控壮快,禁捐考,勒石学门。考恩贡。子云见,卒;云沛未冠中举捷春官入词林。孙九经,州首入学,莲补增,皆卒;苓、菱、葵、蓓入学。”从书中可以看出,沈云沛父亲沈观国通过考试考中了秀才,当时居住在海州古城的西门,也就是沈云沛故居的位置。他在家里设立私塾,以教书为业。

《胸阳纪略》中也记载了沈云沛的简历:“沈翰林,沈翰林印云沛,字雨辰。从李荫远读书陶许庵。未冠,癸酉中举,大挑知县,分发浙江。甲午会进士,朝考一名,钦点翰林庶吉士。”当时考中进士只有两年、风头正健的沈云沛为《胸阳纪略》欣然作序并参与编定。由此可见,书中对他家庭的记载是没有疑问的。

值得一提的是,《家谱》的作者沈采臣曾经见过沈云沛,并进行过多次对话。沈采臣,字东樵,沈云沛是他的族叔。沈采臣是沈氏迁海后第七代沈二酉之后,属于这一门的长房,沈云沛是沈五常之后。沈采臣年轻的时候就在海州沈家读书,曾经把祖辈沈方恒记录的《草谱》请沈云沛过目。或许因为当时的沈云沛已经担任了朝中高官,没有精力过问修家谱这样的琐事;或许他认为沈采臣地位太低,不能担

当修家谱这样的重任。所以沈云沛没有对《家谱》一事做出回应。因此,沈采臣在《序言》引为“恨事”。

从《家谱》中还可以看出,沈氏先祖都葬在灌云、灌南境内的伊山、南岗、武障河一带,沈氏女性大都嫁给了灌云县大柴市、南岗等地。从第五代沈凤翱开始移居海州古城内。

沈氏迁海后支谱取名用字为:“镇得继思凤,维二方士观,云臣有其耀,家华立兆祥。”沈云沛祖父沈士杰、父亲沈观国,包括他自己都是按照《家谱》取名。所以,沈云沛家族在海州地区的发展主要集中在灌云、灌南、海州一带,与徐州新沂市阿湖镇一带的沈氏不存在直接关系。

(作者单位:市委市政府督查办公室)

责任编辑 于冰清



沈采臣书写的《家谱》,内有沈云沛曾祖父沈光奎、沈光道的名字



# 德窥连岛事件始末

李 彬

最早接触到的德窥连岛的史料是许绍蘧先生的《连云一瞥》，在卷首杨光第先生之题诗中有如下一段内容：“去今四十年，外舰来楼橹。（清光绪三十一年春，德舰驶至西连岛，以为觅得新地，竖旗鸣炮，后经交涉，始去）登岸竖国旗，欢呼忭且舞，谓获殖民地，发现新岛屿。直入吾堂奥，吾人骇且怒。据理与力争，舆图在天府。终乃帖然去，海上得安堵。”另外，在《墟沟敦仁堂董氏谱序》中也有篇清状元张謇撰写的《清封中议大夫董公才卿墓志铭》，其开首文字曰：“西人东渡，以商战攫我精华，沿海要区已蚕食殆尽。往十二年，德窥连岛。”

以上是本地史料上有关的德窥海州事件的记载。然而这些史料只是简单记载了德舰占据海州沿海领土之事，而对于事件的来龙去脉则未作详述。笔者在文献资料中又相继得到有关这次事件的史料，故将这段逸史加以整理，以待方家指正。

## 德占山东

在叙说这段逸史之前，有必要将当时的历史背景作一了解。清代末年，列强势力相继入侵中国，光绪二十三年（1897）11月，山东曹州巨野发生两名德国传教士被杀的事件，史称“巨野教案”，德国政府以此为借口，派兵强占胶州湾。光绪二十四年（1898）3月6日德国迫使清廷签订《胶澳租界条约》，租期为99年，将山东省划作势力范围，同年9月，德人开放青岛为自由港。光绪二十五年（1899）10月，德皇威廉二世命名“胶州保护地的新市区为

青岛”。

## 德窥海岛

光绪三十一年（1905）春，德商捷成洋行拟由青岛用小轮“芝罘”号装洋货至海州，并由海州买土货回青岛。署海州直隶州王曜（字耀斋）以海州素非通商口岸未准通行，德商也因为议购豆饼价格不合而开回轮船。在二十多日后，也就是三月廿四日，又有德国舰艇两只，开到海州鹰游门外探测水势，廿六日用小轮载三十余人登岸，其中有携带手枪者，上岸后，强行于居民汪逊远家菜地内拔菜，支盖帐篷暂住，并在山下海边浅滩插立测水木一根，以候潮汐深浅；廿七日德兵登连岛桅尖山顶，树大旗二面。至四月初五日方撤帐拔木，展轮而去。时海州正值院试，江苏学政唐景崇于廿三日到海州按试，海州参将李岳衡赴南京未归，署海州直隶州王曜急命东海营都司宋学亮密往连岛确查，宋学亮报告说德舰在鹰游门外遇拦港沙，不能前进，绕至东连岛外，坐驳船上岸。四月初六，墟沟绅董李焕藻、邵鸿举、董国幹等联名向知州王曜禀报：“德轮泊住东连岛之后，上岸多人，于东西连岛山顶竖旗，维时居民无敢动问洋人，上岸即在汪姓地内拔菜硬支帐棚，鸣炮声威慑居民。”

## 事件调查

王曜觉得事关重大，失土之责已非一个知州所能承担，便一面派兵加强驻防，一面向上禀报两江



总督周馥。周馥得报，深感惊讶，致电德胶州总督，问此举何意？另一面急报朝廷，朝廷便派员与德人交涉。德国驻上海领事则诡辩声称决无此事，嗣后，德国报纸称德兵占领海州之事实属可笑，决无占领之事，因海州附近水浅，不便行舟，德兵上岸实为测量之见。接着，驻北京德国公使也对大清外交部提出强烈抗议，声称：“德兵在海州测量，该州州牧疏于点检，漫禀江督，谓敝国军舰占领海州，以致谣议四起，该州牧实难辞咎，应请电致江督，转将该州牧严行申斥，以戒将来，而保两国之睦谊。”迫于德人的压力，四月十一日，两江总督周馥与直隶总督袁世凯便派知府李德顺乘海容舰与程璧光海军管带同赴海州，共同前往查勘。四月十六日李德顺到达海州，待王曜禀明情况后，即赴连岛调查。李德顺回省后即向周馥报告海州知州王曜禀报不实，欺瞒实情，偏袒绅民，夸大其词，险酿巨案。接着两江总督周馥即予批复：“据禀已悉，此次德国兵轮赴海州测量水道，该州王牧并不查询明白，竟据绅民无据之词，率行禀报，实属荒谬，昨已将该牧记过示惩矣，仰即查照缴。”算是给了德国人一个交代。

#### 知州罢官

在那个弱国无外交的年代，外国兵舰占岛测量、鸣炮插旗，居然还能振振有词，要求严惩地方官员；而守土有责的地方官却因禀报军情而被处罚，真是千古奇事。清末以白

话著称的《直隶白话报》在刊载这段新闻之后一语中的地说：“江督逼得没有法子，就把知州记了大过，唉，岂有此理。”

此次事件不久，王曜就被免去署理知州的职务，黯然离开了海州。而海州的老百姓却对这位为民做主的父母官恋恋不舍、感激涕零。原来王曜到任后，特别关心民生，做了许多除暴安良、顺应民心的好事。百姓们都尊称他为“耀斋王老公



张店王公去思碑

祖”。在海属小伊、张店等地留有数块海州绅民为他树立的去思碑。其中小伊的碑刻上记载着他为小伊山石工申冤，严惩新坝山霸孙冠杰的事迹。在张店镇的去思碑上则刻着“恨公来晚去速，喜公除暴安良，感公勤劳不懈，尊公胆识过人。”虽然王曜在海州州官任上仅数月，却深得地方百姓爱戴。而他却因胆识过人，抵抗外敌而付出了被撤职的代价。

德窥连岛事件虽然过去一百多年了，我们不应该忘记这起发生在家乡的历史事件。如今，弱国无外交的年代也已成为过去，我们的国家日益强大，中华儿女都有责任牢记历史，振兴中华。

（作者单位：市文保学会）

责任编辑 于冰清

**德報不認德人在海州有懸旗鳴砲之事**  
 十六日柏林電云意大利英國各國所載德海軍在中國海州懸掛德旗之消息德國博聞報不為承認原其謠言之來因德國探格兵輪在海州測量水道然當時並無懸旗鳴砲之事亦未與華人為難駐烟台德領事亦已聲明謂德在海州設一陸軍站以便保護內港行輪一事實係不確

1905年5月21日《申報》第11526号第4页载《德報不認德人在海州有懸旗鳴砲之事》



# 历史的星空

——追寻连云港“知青”的人生轨迹(下)

毛太銮

## 插队知青的艰难生活

到农村插队的知青又是另一番天地。

所谓插队,即直接分到村(那时候叫生产大队)所属的生产小队,通常叫生产队。知青下到生产队后,由生产队统一安排住房,从队部腾出房子或指派农民腾出房子,有条件的逐步建知青房,插队知青相对集中过集体生活。开始,国家供应粮食和煤炭,数月后停止供应,过真正的农民生活,与当地农民一样,通过从事农业生产劳动挣工分,年终参与分配,并根据工分多少分得钱粮。

赣榆县、东海县当时属徐州地区管辖,1983年撤销地区实行市管县才划归连云港市管辖。赣榆县、东海县东部为平原地带,中西部为丘陵地带,土地贫瘠,经济条件较差,连云港知青大部分到丘陵地带的农村插队,生活比较艰苦。根据土壤性质旱作物较多,当地的农作物以地瓜为主,还有玉米、小麦,但产量并不高。秋收季节来临,地里到处是地瓜,其中的一部分是应分到一家一户的口粮,也有知青的一份果实。

地瓜是不好储存的,必须切成薄片,晒干后作为秋后及下一年的主要口粮。知青像农民一样,就在收获地瓜的地里,连天带夜将地瓜切成片,均匀的撒在地上,经过几天晾晒,再拾起来运回住处屯好。晾晒地瓜干季节如碰上阴雨天就糟了,地瓜干肯定要霉变,霉变的地瓜干只能喂猪,没有其他用途。

知青在城市生活时,粮食供应主要是米、面,搭配玉米等粗粮,很少供应地瓜干。由于生活习惯,先吃小麦、玉米,吃完后只能吃地瓜干,一日三餐顿顿吃。一开始还有腌萝卜条对付着下饭,后连萝卜条也没有了,只能清水煮地瓜干,时间长了反胃。由于劳动负荷大,肚里没有什么油水,干活时两腿发软,心里发慌。

工分也不是好挣的,干多少活给多少工分,年终兑现。起初,知青对庄稼活一窍不通,当地农民手把手地做示范,经过几个月的锻炼,逐步掌握一些农活的技巧。劳动的艰苦换来劳动的收获,不少知青与当地青年一样,在队里评议工分时拿到高工分。但分值并不高,一开始每个工日能挣0.4到0.5元,后来逐年下降,有的年份分不到钱,只分到少许的粮食,甚至平时借生产队粮食吃,年终算账还倒欠生产队钱粮,以至于回家连车票钱都没有。靠近铁路沿线的插队知青,有的爬运煤车回家,浑身上下都是煤灰;有的上客车逃票,被查票逮到罚款,没钱补票,甚至被拖过到终点站再让你下车,这是一种惩罚。

插队的生活是很艰苦的,但也有别样的欢乐。在田间、在水利工地,青年之间说说笑笑,甚至不分辈份开玩笑,逐渐开启青年男女的心扉。与当地青年接触多了产生恋情,但难以成对,因为更多的知青不想在农村生活一辈子,以至于有的男知青回城留下“小花”的故事,有的已经“开花结果”,无奈之



下只好带进城,这是后话。

### 知青回城的波折

随着时间的推移,上山下乡的热情逐渐消退。农场偏僻艰苦的劳动环境和单调枯燥的连队生活,使知青思想上产生很大波动;农村贫穷落后、经济生活得不到基本保障,更使插队知青产生失落感。知青的家长们逐步了解其真实情况,心中非常焦虑难过,但无任何办法,只能从家中微薄的工资收入和计划供应粮中给予适当补贴。

知青下放中的各种问题,逐渐反映到国家上层,地方各级政府按照中央文件要求逐步解决一些问题。从1971年下半年开始,独生子女下放的照顾回城安排工作;多子女下放、父母身边无人照顾的,允许照顾一名回城。一般是男的回城,女的留下,如果是弟兄的,父母同意谁,谁就可以回城,或者是弟兄俩商量,老大回城的可能性大。

1972年开始,农场、农村从优秀知青中推荐工农兵学员上大学。年底征兵入伍,也从下放知青中挑选,但是能够上大学、当兵的人极少。

1973年开始,农场、农村从优秀知青中推荐进入各类中专、中技。1973年的初夏,江苏省海州师范学校从连云港下放到农场、农村的知青中招生,100多名连云港籍的知青进入海州师范学校上学。夏季,连云港财经学校面向江苏兵团农场招生,近200名农场知青进入连云港财经学校上学,其中连云港籍的农场知青占大多数,这也是连云港财经学校转为江苏省财经学校第一次扩大到全省招生,并全部招兵团农场知青。入学连云港财经学校的知青大多是68、67届初中毕业生,极少数为66届初中毕业生,高中毕业的知青一个没有,入学年龄限制在22周岁以内,高中毕业的知青在年龄上失去优势。1974年连云港财经学校又招一批,除初中毕业的知青,只有极少数是高中毕业生。高中毕业生经过3年半的文革和4年半的下放又进入相当于高中的学校学习,既是个人的幸运也是无奈的选择。

在这期间,一些有病或伤残的知青也照顾回城,既然有病就回家养病,不好安排工作;以后,符合政策规定的知青回城,而不在政策规定范围的,

只要能找到充分理由,如到地方医院开病残证明的,也可以回城。以至于不管真有病还是假有病,都难以找到合适的工作,有的在企业打工,有的被安排在街道上做点事情,给点报酬。

1973年,周恩来总理提出“三年改变港口面貌”的要求,沿海城市港口加快建设,连云港港口列入国家重点建设项目,扩大港区,建设深水码头,急需招收工人。1975年,连云港港务局决定从兵团各农场和东海县分批招收连云港籍知青;同年,连云港矿山设计院和铁道部大桥工程局第四桥梁工程处在东海、赣榆县分片招收数百名插队知青。这是连云港市首次成规模的从知青中招工。1975年后,连云港市白集煤矿(在徐州)根据煤炭生产的需要,又先后两次从插队赣榆县、东海县的知青中招收下井采煤工人。这几次有一定规模的招工在知青中引起极大波动,留下的人心更加不稳。

1977年是“上山下乡”运动的最后一年,也是老知青开始大规模回城的第一年,形成知青回城潮。连云港知青从1977年到1980年大都回城,大量返城知青带来就业问题。连云港市知青办根据上级指示,把知青下放工作转为返城知青工作安排,通过各种办法和渠道逐步解决知青的就业问题。家庭出身好的分到全民企业,家庭出身不好的分到大集体企业甚至街道办的小集体企业。

但是,已经结过婚的知青,包括男方在城市里女方在农村的,或者男方是知青,女方是当地农民的,都不符合回城条件,这就产生了子女顶替的政策,即在城市工作的父母提前退休,让下放子女顶替到父母所在企业工作。顶替工作又带来矛盾,有的家庭有多个下放的子女,是谁顶替,由家庭自主决定。

1980年以后,个别留在农场、农村的也安排了比较稳定的工作。有的结婚成家双方都是知青,直至80年代中期才迁出农场回城。

回城以后也带来一些麻烦。家庭中有已参加工作的弟弟妹妹的,想不到哥哥姐姐们下放这么久还能回城,住房紧张的家庭就产生了矛盾。这个时期又适逢独生子女政策。据了解,南京早年下放我市新浦农场的老知青,回南京后既无住房,又无合适



的工作,有的仍又回新浦农场安家。

1973年至1977年城镇下放知青最多,有些已在1980年之前回城安排就业,更多的是在1980年以后。据市有关资料记载,包括4个县的城镇下放知青,到1990年初,还有近千人因种种原因未回城,可见当时安排就业的困难程度。

### 知青回城后的社会地位与作用

从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到知青下放农村,直至通过各种渠道回城,经历了十多年的岁月。老三届知青的年龄都在二十四五岁以上,有些已经超过三十岁了,回城最大的愿望是有一个比较稳定的工作,然后成家立业。随着时间的推移,对文革期间不同的派性观点早已淡忘,但对下放农村的艰辛经历却铭记于心,因此,倍加珍惜来之不易的工作岗位,勤奋地工作。

在江苏省海州师范上学的两届知青生,毕业后分配到小学教书,有的继续深造后到中学教书,有的提拔到中小学校领导岗位,离开教育系统的很少。

在连云港财经学校上学的两届知青,毕业后多数分配到财税部门和金融单位,少数到学校教书或从事财务会计工作。随着改革开放,党的中心工作转到经济建设上来,这就给学财经专业的学生带来良好的机遇。那时候,财经院校少,毕业的更少,正是青黄不接,学财经专业的中专生就顺理成章的成为财税部门的主力军,有些同志逐步走向领导岗位,成为全市财经战线的中坚。

回城以后到企业工作的知青也不甘落后、自强不息。有的在恢复高考后参加全国统一的高考,实现上大学的心愿,更多的是参加地方成人高考,追回失去的学业。20世纪80年代初,连云港市成立不久的职业大学、电视大学逐步面向社会通过成人高考招生,到市经济干部学校、市委党校等学习的也不少。在各类学校的课堂上,可以看到许多30多岁的中

青年如饥似渴地学习,还有的参加各种函授业余学习和自学考试。具有高中文化程度的,由于文化功底厚,有明显的优势,参加成人高考的较多。通过专业学习取得相应的学历文凭,更好地在工作岗位施展才华,成为企业的生产技术和经营管理的骨干。

知青下放是特殊历史时期造成的,是不以这一代人的意志所决定的,而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企业改制转轨变型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连云港老三届知青与全国知青一样,经历了文化大革命时期、上山下乡运动时期和市场经济发展时期,因为有了这么几段经历,比之后来的年轻一代人,多一些对社会生活的认识,多一些对人生艰辛的领悟,多一些吃苦耐劳的精神,在日常生活和工作中不管遇到什么事情,绝大部分人都有一个平和的心态面对现实。

岁月如烟,人生如歌。曾经的下放知青当下绝大部分已退休在家,开始另一种生活方式。当夕阳西下或茶余饭后领着小孙子散步的时候,或许还能回忆起激情燃烧的岁月和人生奋斗的艰辛与无奈。

知识青年和上山下乡运动,像一道流星从历史的星空闪亮划过,时间短暂,但其社会影响是很大的。它改变了一代人的命运,是新中国成立以后一段不可磨灭的历史。

(作者单位:连云港市土地学会)

责任编辑 邱仕明



“收工啰!”(资料图)



# 报社生活琐忆(续一)

韩世泳

## 做好另一半工作

1958年下半年,“大跃进”形势越发“红火”,全省各市、县党委都办起了党委机关报和广播站。编采人员绝大多数都跟我一样是“半路出家”的新手,对新闻工作都是“一肚白米干饭”,什么也不懂。为了提高新闻队伍素质,省委宣传部及时办了一个新闻干部培训班,全省各市、县报社、广播站都派人去培训,我有幸被报社领导派去学习。

省新闻干部培训班设在南京大学。当时,南京大学已开办了新闻学校,有时,两边合在一起上大课。新闻干部培训班培训时间为三个月,老师都是高手,既有南大的教授,也有新华日报社资深的编辑、记者,南大校长樊发源也亲自给我们讲课。这次培训时间虽短,但对我启发教育却很大。

省委对培训班的教学工作非常重视,开学第一天,省委宣传部部长亲自到场作动员报告。他从全国“大跃进”形势讲起,讲到新闻战线的“大跃进”,面对我们这些“新兵”更着重讲了新闻工作的重要性、必要性和新闻工作者的任务、职责。尤其对于“新闻工作者要做好另一半工作”的论述,我至今记忆犹新。他说,我们有些单位工作做得特别好,取得了很大成绩,这是值得高兴和赞扬的。但是,如果我们的工作就到此为止,那只是一两个单位做的好,还远远不够,我们的工作也只能说是才做了一半,还有另一半更重要的工作要做,这就是及时总结、

推广先进单位的好经验、宣扬模范人物的先进事迹和先进思想,让大家都来学习他们的先进经验,发扬他们的先进思想,使得大家都取得更大成绩,而这“另一半工作”,正是我们新闻工作者的重要任务。新闻工作者就是要通过报纸、广播,宣传、推广先进典型事迹、先进经验和先进思想,去鼓舞、激励、推动人们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

开班第一课的动员报告,让我们这些门外汉对新闻工作重要性的认识,又有了新的提高,在听那些导师的讲授,特别是最后随着苏北报社组到办得比较好的东台日报社去实习期间,我们都特别留意人家是如何“做好另一半工作”的。以至在后来的采访报道工作中,也都十分注意把“做好另一半工作”作为自己的责任。

## “大国防”陪我上山下乡

报社刚开办时条件很差,连一辆自行车都没有,记者下去采访全靠步行。我开始业务生疏,临时被安排在新浦跑跑情况,整天步行到有关单位了解情况,路还不太远。没过多久,编辑部人手紧张,只好“没牛使犊子”,安排我到海州一带去采访蔬菜生产情况。那时市里还没有公交车,从编辑部走到海州就得个把小时,再加上找人采访、写稿子,当天要把稿子交给编辑,极为紧张。说实在的,当时下去办事靠两条腿量,不仅是报社记者,市委、市人委的工作人员也是如此。当时,市委机关只有通讯员特配



自行车。因为那时很多机关单位还没安上电话,市里开会或有其他要事,全靠通讯员骑车子挨家挨户去通知。所以,大家对步行也能理解,毫无怨言。

没过几个月,市委特批给报社六七辆自行车,其中大部分是从苏联进口的,车型矮小、轻便,一只手都能拎着走。而且,车头安有车灯,大杆上配有小型打气筒。只有一辆青岛产的“大国防”牌自行车。刚从省新华日报社调来不久的袁汀副总编对我说:“小韩,‘大国防’结实,就给你跑农村骑吧!”于是,这辆“大国防”就成了我的“专车”,每天驮着我跑农村。

自从有了“大国防”,有更多的时间可以用于采访上,工作方便多了。采访渔业生产情况必须到连云港去。去连云港虽然有火车,但是时间不合适,也只得骑着“大国防”去。从新浦去墟沟的公路,虽然没有现在这么平整的路面,但砂石路还平坦,晴天骑车子在上面跑还是挺恣的。可是,从墟沟往连云镇去,路都在山脚下,有很多破路,骑起来很吃力,特别是庞沟那地方(那时还没有庞沟大桥),下坡非常陡,骑着车子往下时,手闸、脚闸都用上,车子还有点往下冲,得非常小心才行。等到了沟底再想往上骑,可再也蹬不动了,只好推着车子往上走。有时到宿城公社去采访,为了赶时间,也只能骑着“大国防”去。从新浦出发一直到云山公社都是平路,不成问题,可到了虎口岭就不是那回事了。此处又名“留云岭”,山路狭窄,曲曲弯弯,只能推着车子一步一停地往上走。有的地方山路崎岖,乱石连连,车子推都没法推,只好提着它往前走。

骑车子走山路,虽然难走,但总还算可以。而且,在那个年代能有“大国防”骑着,也是挺自豪的,累点也不算什么。可

是,骑车子跑锦屏(公社)、新坝(公社)有时就很难看了。这一带是一马平川,“大国防”在上面跑起来飞快的,很省劲。可这里都是盐碱地、油泥。几天不下雨,路上就有很厚一层泥灰,给车轮一搅,四处飞扬,浑身都是灰尘。遇到下雨,那油泥又黏又滑,寸步难行,人不但不能骑它,还经常被它“骑”。记得一年夏季的一天下午,我在沙杭大队采访结束回公社驻地,当时天还好好的,可快到陈户村时,几个响雷一打,云就到了头上,雨也就下来了。没骑多远,前后车轮的大皮与盖瓦之间,都已被油泥杂草塞得死死的,一动也不能动,没法骑了,只好扛着车子,一步一扭地往前走。路过陈户村庄时,靠路边一家门洞里有几个人看了说:“这青年,有车子不骑,让车子骑他,真有力啦!”我明知他们是在打趣我,也只好当没听见,继续让“大国防”“骑”在我肩上,一步一步往新坝走去。

### 我们的食堂

市报刚创办时,只有编辑部,没有印刷厂,人很少,编采人员就在市委机关食堂就餐。



原市委机关食堂所在地(现新市路第一池对面)



市委机关食堂离报社不远，就在新市路路头、第一池对面，几分钟就走到了，倒也方便。据说，解放前这里就是新浦比较有名的饭馆——第一饭庄。和路对面的东亚旅社（今市民俗博物馆）、第一池等相互配套，成为新浦一个高档次服务区。这儿门面不出奇，但院子很深。解放后，因为市委机关就在新市路西头（今市机关幼儿园北一部分），市人委在民主路与市民路交叉口，离这也不远，这儿便成了市机关食堂。报社中家不在新浦的职工，每天就在这儿就餐。报社编采人员每天加夜班，也在这里吃夜餐。市委食堂对报社加夜班的人很关心，每晚都有专人值班，让大家吃到热饭热菜。

第二年春天，报社开始自办印刷厂，编辑部人员也不断增加。为了便于工作，1960年，报社自己开伙，从此，我们有了自己的食堂。

报社食堂设在报社前院东侧的一排旧平房里，屋很矮，伸手就够到屋檐子。南头3小间是伙房，北头2小间是饭堂，里边放两三张简易方木桌子和长板凳，供大家吃饭。伙房和饭堂中间隔墙上开有窗口，大家就从这里买饭，打菜。食堂前边有棵大柳树，树下砌有洗碗池。食堂的大师傅，一个叫程庆生，一个叫王敦诗，都是从市委食堂调来的。王师傅在报社食堂时间不长就调走了，印象不深。程师傅和我们相处十多年，给我留下了很深印象，很多事情至今仍历历在目。

报社办食堂正值三年困难时期，粮油都是按人定量、凭票供应，副食品极为匮乏。报社领导在征得市领导同意后，在市机关园艺场划得了一块荒地，并抽几位同志去开荒种地，平时也会组织编采人员轮流去劳动，种瓜种菜，供食堂食用。但这毕竟有限，而且不可能天天都有菜收。因此，食堂所需的蔬菜、副食品更多的是靠食堂自己想办法。大家的口粮是定量的，而且标准很低，我们跑外勤的一天也只有一斤多一点。为了让大家吃足自己的定量口粮，保证凭饭票公平供应，程师傅动了不少脑筋。记得那时他做馒头时，每次都称好面粉，发酵好后又把面团切成几块，上秤称了又称，互相找补，不厌其

烦，直到几块面一样重为止。而后又把每块面揉搓成一样粗细的长条，再用一根一米长、上面等距离地钉着一些钉子的板条，往面上一按，然后按照面上的钉印子，小心地把面切成一个个、一样大小的面块放到笼里蒸。这样蒸出的馒头几乎没有悬殊。蒸饭也是如此。以往，市委食堂做米饭都是在大锅里做，卖饭时用铲子往碗里装。现在，口粮少了，再这样盛饭会不太均匀。程师傅他便改变做法，用笼蒸。他经过多次反复试验，摸出规律，约定量器，让蒸出的一碗碗干饭一样多。

程师傅原是“白案”拿手，后来食堂就他一个人，“红案”“白案”都得干。为了让大家吃的好，他不断提高自己的“红案”技术，改善大家生活。20世纪60年代初，副食品供应也极为困难，猪肉都是定量、凭票供应，而且，数量极少。我们跑农村的人，无法把计划带下去，各公社大队食堂吃的更差，极难吃到猪肉。时间一长，大家肚里没有油水，我和秦俊同志都得了浮肿病。那腿、膀子上的肉像块死面团，用手指一按就瘪下去，迟迟爬不起来，整天四肢无力。那时，编辑部各组一般每周末都要开会，研究下周报道计划。程师傅看到我们的身体状况，很体谅、关心我们，周末前他都要想办法，托熟人买点猪下水、猪头一类回来加工，或烧或炒或卤，制作成几样菜。同时，要蒸笼新馒头，给大家吃。因此，我和老秦同志经常能在周末吃到透暄的热馒头和猪头肉。那猪头肉跟发糕似的，切成一片片，往热馒头中间一夹，咬到嘴里直往下滴油，十分过瘾。一周的疲劳，顿时消去大半。

（作者单位：海州区地方志办公室）

责任编辑 邱仕明



# 朝阳水库那些事

## 夏 天

截至 2015 年底，全市共有大型水库 3 座，中型水库 8 座，小型水库(含塘坝)167 座。这些水库大多建于 20 世纪 50 年代至 80 年代间，尤以 1956 年至 1958 年为多。笔者家乡连云港经济技术开发区朝阳街道办事处，地处市区东郊，境内水库也大多完成于那些时候。虽然都是一些小型水库，但数量却不少，共有 12 座。

水库工程，在现代人的眼里，也许算不了什么。一座中型水库，有几台挖掘机、推土机，几十台大型自卸车等工程机械，几个月时间就可完成。可在 20 世纪 50 年代，则完全靠镐头、铁锹、抬筐、平车等完成。在进入新世纪的今天，这些水库还在为我们的生活、生产发挥着重要作用。

笔者出生于 20 世纪 50 年代末，虽未全部参与每个时段的工程建设，却也目睹了部分水库建设时的感人场景，对短暂体验了那段火热的生活仍引以为豪。

### 黄泥塘水库的诞生

在 20 世纪 50 年代中期，朝阳境内还没有水库，人们对建水库没有经验。即便当时的整个连云港市郊也没有建水库的先例可循。在这种情况下，乡党总支书记陈志学、副书记薛永高、副社长李志标等一班人，决心自力更生，开启水库建设之先河。首座水库建在哪？大家怀揣干粮，踏遍了合作社东、西、南三面大山，对各山涧的长度、流量，进行了细致的观察、比较，计算着流量、可蓄积水的方数。在当时农民连肚子都填不饱的情况下，他们不敢草率定案。他们知道，万一失败，如同犯罪。他们不知翻过了多少座山头，行走了多少路程，考察了多少个现场，在煤油灯下召开了多少次会议，终于在 1956

年冬定下了首座水库建设方案。该水库地处现朝东居委会东山脚下，建库时间在 1956 年 11 月，坝高 22.27 米，库容 26.37 万立方米。水库最后定名为黄泥塘水库。它虽是一座小型水库，但在当时无任何旱涝设施的情况下，其意义之大可想而知。更重要的是，为后来的水库建设积累了经验，第二年就一鼓作气地拿下了西山水库建设工程。

这两座水库完成后，使今天的新港城大道南侧的那片农田种上了水稻，部分田块实现稻麦两熟。

### 首座蓄水量超百万方水库

1958 年，朝阳人决定建一座规模相对较大的水库，总蓄水量超过百万立方米。当时，市里和云台人民公社(时辖云城、中云、胜利、朝阳、大村 5 个生产大队)初定库址在小李巷(今韩李村东片)。而党总支在研究时产生了分歧。部分支委主张将库址放在新县。为此，党总支发扬民主，将两套方案都摆出来，交由群众讨论。这两套方案各有利弊：小李巷，地势高于新县，能灌溉境内全部耕地，占用耕地 300 亩，需搬迁农户 150 多户，预计投资 60000 元人民币(不含劳力)；新县，地势低一点，有 1000 多亩果园灌溉不到，占用耕地 30 多亩，另有不到 1000 亩低产山地，需搬迁农户 13 户，预计投资 20000 元(不含劳力)。通过比较，在哪里建这座大水库合适，大家一目了然。最终，这座水库地址定在新县。经报上级批准后，连勘察设计在内，仅用 5 天时间。紧接着，9 个村共 4000 余劳力浩浩荡荡地开进了施工现场。

该水库工期原定 180 天，力争 165 天。但是全体朝阳人以冲天的干劲，仅用 123 天，就将全部建设任务拿下，比原计划提前了 57 天。



### 清基过程中的两场硬仗

1971年,朝阳历史第2座大水库,现今库容量最大的水库——朝阳水库建设工程打响。这座水库也就是1958年在新建县水库前大家热烈争论的当时两套选址方案中的一套——小李巷方案。限于当时经济状况,最终选择了占用耕地和搬迁农户少、用工省、投资低的新县方案。随着测量水平的提高和生产力水平不断增强,大家认为小李巷地区几条大涧实施有效拦截后,可蓄积自然降水200万立方米以上,几乎是新建县水库两倍。经反复论证,最终定下了这一利在子孙、功在千秋的建设方案。在完成对库区150户农户搬迁后,于1971年冬,打响了建设这一水库的战斗。

清理坝基,是该水库一块难啃的骨头。开工不久,在韩李工段,遇到烂崖层。所谓烂崖,是指将烂又未烂的地下石层。它比泥土硬,比石头软,铁锹挖不了,镐头一镐下去刨不了一指深。而用炸药,一次只能炸出脸盆大的洞。对这个软硬不吃的家伙,朝阳人没有被难倒。韩李大队党支部书记李正业站出来了,带领大家,找来炮锤、钢钎,朝烂崖顶一站,豪迈地说:“我就不相信啃不动它!”在凌厉的寒风中,李正业和他的伙伴们抡起二三十斤重的炮锤,流星般地砸向钢钎。一块,两块,三块……一天,两天,三天……接连不断地砸、撬、挖,终于在第五天,将这条两米多深的烂崖层清除掉。

请走烂崖后,该朝基上返土了。但这时,地下水却像喷泉一样,呼呼地直往上冒。公社党委书记李恒泉和几名党委成员都站在积水中,指挥战斗。两台水泵同时作业都没有泉眼渗水快。几十名社员跳进水中,庖斗、木桶、脸盆一起上,和地下水赛跑。在积水稍干后,刘巷5队生产队长张传友走到泉眼前,不顾天寒地冻,甩掉棉衣,仅穿一条短裤,抡起一把二三十斤重的木锤,接连不断地向几处泉眼砸去。10多分钟后,泉眼终于被砸实了,不再向上渗水。大家趁热打铁,找来石灰拌上黄土及时封堵。尔后终于迎来大范围的返土。

### 铁镐头·木锤·木橛子

1965年秋,我读小学一年级。那时,学校经常组织校外教育活动,诸如请战斗英雄讲革命战争故事、请老贫农忆苦思甜、祭扫烈士墓等。这年冬的一

次教育活动,使我首次目睹了建水库繁忙而又热烈的场景。由于工地上人、车混杂,我们不能进入现场,只能站在山坡上远远地观看。一大片约4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被有序地切割成五六十个施工现场。在每个工段,人们手中挥动着不同的工具,脸上带着笑容,不停地忙碌着。虽数九寒冬,却看不到一个穿棉衣的人。大坝指挥中心的大喇叭里,不时播放着水库进度和好人好事。

在村头,我见到一个铁匠铺,铺里摆满了大量的被卸了柄子的铁镐头。铁匠师傅说,入冬以来,他的活儿格外忙。为什么呢?就因为水库工程,每天要接到数十乃至上百把镐头到这里淬火或加钢。当时我似懂非懂。等我稍大以后,才知道,这铁镐与木锤、木橛子是水库建设取土时必不可少的三大件。与现在的河道、场地等工程离不开挖掘机一样。

先谈铁镐。它是刨土专用工具。平时刨土,只要将表面土层刨起即可。而在水库工地,镐子不是这样刨的,而是将厚厚的土层,从根部刨出一条三四十厘米深的横槽。刨的时候,由两个人分大小手(双手握工具柄,左手在前者为小手;右手在前者,为大手)从中间各自向两侧退着刨。为什么要退着刨呢?因为从底部开了槽的土层很容易突然坍塌。而退着刨则可以避开被塌下的土层埋压的风险。但是,开了槽的土层多数情况下是不会马上就塌下来的,它需要到顶端用特制的木锤与木橛子,通过外力撑开巨缝才能塌下。

这就说到了木锤与木橛子。木锤与木橛子都是由云台山上最沉、最结实的树木——檀木原木制成。其中,木锤,长约50—60厘米,直径约25—35厘米,重量15—25公斤不等。木橛子,长度60—70厘米,直径15厘米左右。一端削成圆锥状。操作的时候,将木橛子按80厘米左右的距离将其成排分布于土层外缘向里约1米处。然后一一将其钉入土表。接着,挥动木锤,依次猛砸木橛子。随着木橛子一寸一寸地嵌入,土层会沿木橛子排列的这条直线,慢慢涨出裂缝,越涨越大,再加之已开了槽的土层根部已空虚,土层很快便会轰然塌下。

各生产队使用铁镐、木锤、木橛子的取土人员,有两三个人足矣。但他们绝对是队里体力最棒、又精明强干的男劳力。每次我看到他们挥动手中的铁镐、木锤和那充满阳刚之美的一招一式,都受到深深地感染。不怪乎人们说,工人农民什么时候最美?



劳动的时候。

### 好大的平车大军

建水库,主打活儿就是将库内大量黄土移到坝基上。当累积至设计高度后,水库即宣告完成。听老人讲,起初运土全部靠抬筐。直到1960年后,平车取代了抬筐,成了运土主打工具。每个生产队,在每一座水库工程开工前,都会根据劳力多少,添置一批新平车。少的十三四辆,多的二十多辆。当时的朝阳公社共有65个生产队,那就至少要添置1000辆平车。仅从这平车数量上,就可看出这是一支多么庞大的建设大军啊!

1971年冬,我上初一。生产队规定,达到15虚岁的男女青年,就可以作为公社社员参加集体劳动。这一年,我刚15岁,又恰逢朝阳水库这座全公社最大的水库工程动工。但我们那帮小伙伴还在上学,只有每个星期天才能和大人一起去工地。对于这一劳动,我的心中充满期待,那心情就像现在即将要去一个地方旅游一样。在工地,最让我震撼的就是那上千辆快速滚动着轮子的平车大军。

这些车辆的使用者,以各生产队的青壮劳力为主。运输时,没有一辆车的主人是走着拉车,全都是跑着的,简直就是一一场场竞赛。一辆平车一般由两人驾驶,一推一拉。我们这些未成年的劳力均作为成年劳力的副手出现在这支大军中。一般一车土十几分钟即可装满,然后往坝上运送。各生产队的车道上总有几辆车在穿梭来往。而放眼整个库区,则不是几辆了,而是数十数百,那繁忙的场景,与其时热映着的电影纪录片《红旗渠》有很多相似之处。这些车辆各走各道,虽然繁忙,却秩序井然。

在取土场至坝前,走的都是平路,而当开始向坝上运的时候,就开始爬坡了。而且随着大坝越来越高,其坡度会越来越大。这时,一车土依靠人的力量是很难上得去的。朝阳人是有办法的。其时,半机械化在这里首次登场。它是由社里的一些土专家用电动机、变速器和钢缆制作的牵引设备。每当一辆装满泥土的平车进入牵引区,便由一名牵引操作人员用钢钩朝平车上一挂,平车便随钢缆徐徐前行,推拉人员不用使劲,只要把车稳好便行。据知情者介绍,在当时水库建设工地,安置牵引设备的地方有数十处。它初显了机械化在农业战线上的威力。

### 长眠库区的三位巾帼英雄

建水库,是朝阳人在改造自然过程中的一项伟大的生产运动。在这一过程中,诞生了一批又一批建设英雄。其中,有三名女英雄,献身于这一伟大的生产运动中。她们是叶开美、于佃珍、金见娥。

叶开美,西庄人,1923年出生。1957年冬,西山水库正紧张地进行着。贫农出身的叶开美,总是出工走在前头,收工走在后头。一天上午,叶开美的筐里装满了土,她嫌不够满,又去搬了一大块。不幸的事就发生在这个时候,她身后一堵三四米高的土层突然坍塌,几十方土一下子压在叶开美身上。人们火速从四面八方赶来,把她从巨土块下救出,送医院急救。在路上,这位坚强的女社员,首先想到的不是自己的生命,而是水库建设。她对随车的乡党委副书记薛永高说:“大兄弟,我可能活不了了。你回去后告诉大家,不要因为我影响建水库,一定要把这座水库建好。”由于伤势过重,人们最终没能留住她的生命。叶开美牺牲时,年仅34岁。

金见娥,刘巷村人,1922年出生,1971年牺牲于朝阳水库建设工地。那是冬日的一天午饭后,笔者当时在西山大队工地。我们刚□下饭碗,就听有人惊呼:“刘巷工区砸倒人了。”顿时,各工段的人纷纷向出事地点奔去,当笔者赶到时,人已被救走,但很快传来伤者已逝的消息。这时大家才知道她的名字。那天刚吃过中饭后,在人们还没动身时,金见娥已来到工地。当她拿起铁锹准备干活时,没想到,也因土层坍塌,夺去了她宝贵的生命。她的死可能感动了上天,在传出她去世的消息后,天空就飘起纷纷扬扬的雪花。

于佃珍,刘巷村人,1917年出生。1966年12月,在新县水库维修工程中牺牲。由于年代久远,笔者暂无她的详细资料。但这并不能磨灭她对朝阳水库建设所作出的贡献。与叶开美、金见娥一样,她的名字长存朝阳人民的心中。

(作者通讯地址:海州区郁洲南路景山秀水2期c5-2-501)

责任编辑 邱仕明



# 徐福故址之发现与 赣榆县建县年代初考

葛永明

1984年4月18日,《光明日报》发表罗其湘、汪承恭的论文《秦代东渡日本的徐福故址之发现和考证》,认为赣榆县金山乡徐阜村是徐福故里,引起国内外史学界的关注,并因此再度掀起徐福研究热。

徐福,是我国历史上有文字记载的东渡扶桑第一人,是伟大的航海家,稻作文化的传播者,中日友好交往的始祖。由于史籍记载不详,内容简略,长期以来史学界许多学者对历史上是否确有徐福其人其事持怀疑的态度,甚至认为秦始皇派徐福率三千童男女东渡三神山求长生不老药是神话传说,是历史上的虚构故事。尤其是在记载徐福东渡一事本来就不多的史籍文字中,对徐福其人,仅有“齐人徐福”了了数字的描述,而无确切的地址故里。虽然战国末期,齐地甚大,徐福作为方士,周游四方,行无定址。但作为雄才大略、一统天下的始皇帝,多次拨巨款、派兵士协助徐福东渡,对这样重大事件中的重要人物,仅以“齐人徐福”四字搪塞,更增加了后人对是否真有徐福其人其事的疑虑,史学界对此持怀疑态度也在情理之中。

1982年5月,在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次全国地名普查中,赣榆县的地名普查工作者在金山乡普查时发现,徐阜村原名徐福村,村里有大量的古遗址和出土文物,并且流传着许多有关徐福的传说。“徐福村有望是徐福故里”这一发现,引起了地方政府和有关专家学者的重视,徐福故里考察研究工作迅速展开,因此就有了徐州师范大学罗其湘教授和赣榆县地名普查工作者汪承恭先生合作的《秦代东渡日本的徐福故址之发现和考证》一文。这篇论文首次向世人披露“江苏省赣榆县徐福村是徐福的故乡”,这是举世徐福研究最具突破性的学术成果,亦是徐福研究进入新阶段的重要标志。尤其是论文中对“徐福村为徐福故里”的论证,能在国内外享有盛誉的《光明日报》上破天荒地发表,不能不说是史学界对这篇论文的重视,由此引起国内外史学界和徐福研究界的高度关注是不言而喻的。自此始,国内外史学界纷纷从史科学、历史地理、航海史、中日关系史、考古、民俗等学科对徐福其人其事进行再认识,再度掀起了世界性的徐福研究热。此后由于连云港徐福研究会的成立,徐福研究成果的不断涌现,“中国·赣榆徐福节”的不断举办,国际性的徐福学术研讨会在赣榆的不断召开,学术界基本认同徐福故里就是赣榆县金山镇徐福村。这一伟大的研究成果,同时也使世界了解了赣榆,使赣榆走向了世界。

1984年7月31日,中国新闻社报道:“陕西省秦



陵考古队,新近在位于西安市骊山北麓的秦始皇陵园刑徒墓中出土一批陶文……”陶文内容包括死者姓名、籍贯、爵位、罪名等,已具备了墓志的形制。其中有十八件载有“兰陵”“平阳”“平阴”“博昌”“武德”“扬民”“赣榆”“东武”等标有死者籍贯和名字的陶文瓦片。内有两块瓦片为“赣榆距”“赣榆得”。

对赣榆县来说,这是真正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重大的考古发现,它将赣榆县的建县年代整整提前了一个朝代,并且对赣榆县名来历作出了重要的、最具权威的诠释,对徐福及徐福故里的研究,对赣榆姓氏研究都有着重要的意义。

在此之前,赣榆县建县年代最早见诸文字记载的是《汉书·地理志》,言赣榆属琅琊郡所辖五十一县之一。国内外许多权威性的辞典、工具书以及历史上的《赣榆县志》均依此说,即根据《汉书》记载,赣榆为汉置县。虽然也有一些学者认为汉承秦制,赣榆可能建置于秦代,但由于无翔实的史料和考古发现作为证据,提此疑义,难以令人置信。

1979年12月,秦始皇陵西侧赵背户村社员在平整土地时发现秦刑徒墓地。始皇陵秦俑坑考古队随即进行了勘察、发掘,经清理,发掘出刻有死者姓名、籍贯、爵位、罪名的陶文残片十八件,其中一件为“赣榆距”,一件为“赣榆得”,字体基本上是阴刻小篆。这是中国最早的墓志,记载了赣榆一个叫“距”,一个叫“得”的人,在此修陵墓并在死后葬于此。查秦始皇陵修建的时间,上限最晚也应在秦始皇二十六年统一六国时,即公元前221年,下限最迟在秦二世二年,即公元前208年。墓志陶文的发现,说明秦或秦代以前,已有“赣榆”这个地名,但是否已建县?据考古界的权威专家考证,赣榆县在秦代已建县,这是肯定的。其一,因为秦代墓志的特点是籍贯写到县,下面紧接着写人名。有的还写爵位、罪名。也有少数是县名下面连带记某亭、某里、某人的。“赣榆距”、“赣榆得”这两块瓦片记载的就是赣榆县一个叫“距”,一个叫“得”的死者。所以当时赣榆已置县无疑。直至今日,到省外出差或工作,别人问起籍贯,肯定会答曰某省某县或某市某人,这是习惯,也是常规。其二,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实行中央集权制,行政区划设郡、县、亭、里,在所出土的十八件墓志瓦文中,人名前载有地名的有十四件,其中县名以下记人名的十件,县名以下连带记亭名、里名再记人名的四件。由此可见,赣榆的这二

位逝者与大多数逝者一样,籍贯记到县。其三,查墓志瓦文中所载地名,均为古县名,有的今天仍沿用,有的历史上曾为县,今仍是地名,只不过降为镇名或其他区划名。其四,墓志瓦文中出现的县名,大都为今天山东、河南古地名,这与史籍记载完全相符。《史记》《汉书》均有记载:“及并天下,徙送数十万,诣七十余万,修筑骊山”,“始皇修骊山,吏徒数十万,旷日十年”,“秦始皇葬于骊山,故郡国送徒往作”。秦始皇在骊山修建陵墓,所用工人,均为灭六国,一统天下中所俘获的兵士和反抗秦暴政的原六国遗民。齐国是最后陷落的国家,且反抗最甚,将齐人作刑徒大批发往骊山修陵墓,这是必然的。这批故去的刑徒,或是同一批征发,或是按籍贯编伍,总之,皆为六国遗民无疑。赣榆古之属齐,秦初天下设三十六郡,其中琅琊郡里有赣榆县,这是史实。今天我们研究徐福其人其事及徐福故里所在,可知“齐人徐福”即齐之赣榆县徐福也。

“赣榆距”“赣榆得”两块墓志瓦文的发现另一重要意义在于对赣榆县名来历的诠释。赣榆县因历史悠久,史料断失,是目前全国2000多个县市中少数几个解释不清县名来历的县份之一。古往今来,众说纷纭。大致有“贡榆”说、“子贡植榆”说、“赐榆”说、“肝榆”氏族说、“古越语音译”说、“赣愚”说等,总之,皆因证据不足,难以自圆其说。值得注意的是这次发现的两块墓志陶文中,赣榆县的“榆”字,均从“手”,不从“木”,结合已发现的汉代以前的所有有关赣榆的封泥,如“赣榆令印”“赣榆丞印”“赣榆马丞印”“赣榆盐官印”等等,“榆”字也都是从“手”不从“木”,所以可以断定,凡以“榆”字解释赣榆县名来历的,都不能确论。原因很简单,赣榆县得名与“榆”字无关。虽然也可以认为“榆”“榆”在古文字中能够通假,但从墓志陶文和汉代封泥中均使用“榆”字来看,“榆”是本义无疑。因此,“赣榆距”“赣榆得”这两块墓志陶文的发现为我们研究赣榆县名来历提供了新的依据和线索,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作者单位:赣榆区党史县志办公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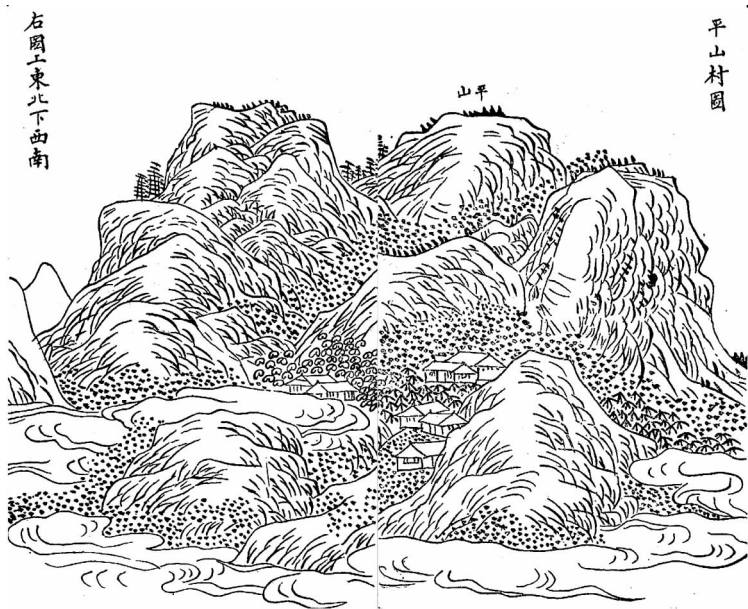
责任编辑 张伟敏



# 二疏散金到平山

——寻古云台十八村之十五

伏广喜 闫祥富



清《云台山志》平山村图

从新浦乘车至开发区,北行至两座小山的豁口,这里是进入北云台山的门户,今日连云区云山街道办事处平山村。这个平山村,亦在云台十八村之列,是五羊湖北、北云台山片西数第一个村子。

清时的平山村,南望滔滔的五羊湖,背依青翠、挺拔的平山。“居民四五十户,业农。”(《云台导游诗钞》)“北望平山此地经,徘徊匹马一鞭停。迷踪树老空山碧,洒墨苔深断碣青。古址已亡归气数,前朝遗迹感飘零。欲寻胜迹随流水,剥落墙垣望渺冥。”这是晚清诗人张学瀚当年写下的《平山村》一诗。从这首诗中可以看出,昔日的平山村也是一个非常古老的、有着斑斓史迹的村落。

这里过去有一个黄墓庄。为什么叫黄墓庄呢?因为庄里有两座非常古老的坟墓,名黄儿墓。墓里长眠着中国古代两位著名的贤人。这一说人们马上便知是汉代的疏广、疏受叔侄。关于他们的墓,众多的地方志书上有明确的记载。如:明正德、天启两个版本的《淮安府志》《隆庆海州志》,清《康熙海州志》,乃至清康熙中陈宣的《续海州志》,皆云“二疏墓在东海平山”。清李普元的《东海志》也称:“(二疏墓)在万金湖北岸平山东岩下。”赵一琴的《续东海志》则称:“与沃壤山连麓,平山东岩有二疏墓。”相传二疏墓的黄瓮子(又称古瓮子)今还在,古墓边



石刻龟座还在,只是墓碑已不知去向。

二疏为汉代人,《汉书》对他们有详细记载。疏广,字仲翁,少好学,善解《春秋》。家居教授,很多远方的人都前来就读。由于学识渊博,被朝廷征为博士,官拜太子太傅。这是辅导太子的官,或者说是太子的老师。疏受,字公子,因品德贤良而被举为太子家令。一次,汉宣帝到太子宫,疏受迎接,与皇帝交谈不亢不卑,应对自如,辞令得体。皇帝对他很有好感,便授他为太子少傅。每次跟随太子朝见皇帝,疏广在前,疏受在后,皇帝并称他们为老师。叔侄二人居官5年,皇太子12岁那年,疏广对疏受说:“知足不辱,知止不逮,功成身退,天之道也。不去,恐存后悔。”二人向朝廷递交了辞呈。皇帝批准了他们的请辞,并赠送黄金20斤,皇太子又加赠50斤。临行前,朝廷里的大臣、故旧纷纷到东门外为他们送行,送行车辆有数百辆。

疏广、疏受归乡后,不买田地,不置房产,而是“散金与诸故旧,召乡老欢饮”。家乡的一些父老劝他多留些钱财给子孙。疏广认为钱是好东西,但钱如果多了,对有作为的人来说会损伤他们拼搏的意志和创业的激情。对无作为的人来说,则会使他们变得更加懒散和骄奢淫逸,甚至招来横祸。乡里人被他们叔侄这种视金钱如粪土的情操深深感动,在村里建起一座散金台,以作纪念。

北宋仁宗乾兴元年至景祐二年(1022—1035),石延年通判海州,为纪念这两位贤人,在平山建有景疏楼。从明正德《淮安府志》所援引的一石刻看,当时一位叫叶祖洽的人为具体承建人,“宋叶祖洽慕汉人疏广疏受之贤,遂建此楼”。该楼时称“淮海第一楼”,一直存至金代。即使在金兵侵占海州时还存。当时的景疏楼高大、气派,内奉二疏像,壁嵌有众多的碑刻。比较著名的有晋代陶渊明、唐代李华等名人诗文。景疏楼诞生以后,成为古海州一个重要的地标。众多的文人雅士为之吟咏挥毫,留下千古佳话。其中,宋代大文豪苏轼一人就写有多首,可见他对二疏是十分景仰。目前可知的有:《和咏二疏》《二疏图赞》《次韵孙巨源》《寄孙巨源永遇乐诗序》《次韵孙巨源寄来涟水李盛二著并以见寄五首》《送赵寺丞寄陈海州》。其中的《二疏图赞》,

被镶于景疏楼墙壁上。在这首诗中,诗人四次提到平山村的景疏楼。以上六首诗中三首标题提到的孙巨源,为当时的海州知州孙洙(宋神宗熙宁四年知海州),巨源为其字,是一名良吏。可见苏东坡与这孙巨源关系不一般。从第三首《寄孙巨源永遇乐诗序》中可以看到,他还和当时的海州太守于熙宁七年(1074年)十一月十五同登景疏楼:“……以十一月十五日至海州太守会于景疏楼上。”金代诗人党怀英也有诗云:“景疏楼下无边水,暂濯尘缨可自由。”这当是景疏楼存世时留下的最后一首诗。

不过,对于二疏墓是否存于平山东岩,是一件历史公案。原因是二疏非海州人,山东承县又分别有疏广、疏受墓。海州旧志书《嘉庆海州直隶州志》和《云台新志》等就刊载了这一公案。早在北宋时,科学家沈括在他的《梦溪笔谈》中就平山一说提出过不同看法。沈括提出不同看法是针对早他31年出生的石延年的。认为石延年当年认定这二疏墓“不讲地志”,过于草率,“极为乖误”。由此,一些地方志书纷纷转录,否定这座古墓与二疏的关系。然而,让人不解的是,即便当时石延年考证不足,那早石延年64年出生的北宋著作郎乐史是否也“不讲地志”?其结论也“极为乖误”吗?因为乐史在太平兴国中所编的《太平寰宇记》中,早已郑重地将二疏墓录于当时的海州东海县名下。不管二疏出生在哪里,归葬何处,不影响二疏与古海州的文化渊源。还有,历史上的散金台、景疏楼是永远抹不掉的史实。云台山东滨海道,西接徐邳,北控齐鲁,南蔽江淮,与朝鲜、韩国、日本隔海相望,一直被誉为中华“岛门屏障”“漕运重地,南北咽喉”从元代开始,朝廷漕运的粮食、供应京城和军需的物资,大部分均经过这里。明代,其运道由云梯关经新坝、过鹰游山、安东卫、石臼所,经胶州东北转成山卫、刘公岛、威海卫,入直沽,抵天津。从今日的南城一路向北转东,过五羊湖,再到平山,为这条水道必经之路。《明史·海运》中写道:“沿途立堠表识,使舟人知所避,而海险不为患。”本寻古系列之三曾介绍小村有两块立石组成的旗杆夹。在平山,同样存有两块这样的旗杆夹。它们同为朝廷为漕运沿岸所立的航海标识。



平山这两块旗杆夹,一块高 180 厘米,一块高 175 厘米。形状与小村的旗杆夹差不多,只是平山的这两块旗杆夹每块比小村的多一个孔。目前,平山这两块旗杆夹保存完好,而小村那两块有一块上半部已断去。平山和小村这两处旗杆夹同是我国丝绸之路由海上东延的见证物。

在现代连云港的历史上,平山这块弹丸之地,其作用不可小觑。1935 年,由赖琰任筹备处处长的连云市,市区计划共分 7 个区,平山归于第一区,区域在今平山、西小区、汪庄一带。这显然已将平山列入连云市中心区域。其交通计划大纲,计划以西山区、平山、汪庄一带为中心,放射 5 大干道:一通连云港(口),二通五羊湖至大小板桥,三通江庄至朱曹(今诸朝),四通新县至猴嘴,五通张圩至西墅。这以平山为中心的 5 大交通干系后来不仅一一实现,其基本格局至今都没有大的变动。

明代吴承恩的小说《西游记》第 32 回至 35 回,讲述了唐僧师徒四人出宝象国,来到一座方圆“六百里远近”的大山,路遇两个妖怪,孙悟空与之斗智斗勇的故事,是《西游记》中名篇之一。这一故事的背景地就在平山及周边地带。与《西游记》对照起来,起码有 5 处十分吻合。其一,小说中这座山叫平顶山,是“巍巍峻岭,削削尖峰”。平山村背后的山叫平山。南坡较平缓,而北坡却是崖悬坡陡,怪石嶙峋。其二,小说中两个妖怪所住的洞穴叫莲花洞。在平山村东南,亦有一洞,因近处有一高耸入云的石柱,状似莲花,因而莲花洞为该洞名称之一。其三,小说中银角大王的母亲是九尾狐狸精,住在压龙山压龙洞。而平山东面的高公岛既有压龙山,又有压龙洞,民间还有九尾狐狸的传说。其四,小说中的太上老君,是这四回故事的重要源头。在平山向东不远,有一座老君堂庙,内供太上老君,是北云台山唯一的老君庙。庙后山上有老君洞,《云台导游诗钞》称“在老君堂半山腰上,峭壁陡立,中开一洞,深不可测。洞外石上蚌壳满崖,相传老君修真由此。”其五,这四回故事的中金角大王、银角大王,下界为妖前分别为太上老君看金炉和银炉的童子。到平顶山则称金角大王、银角大王。在平山村,则有紧挨着平山的金山与银山。而在老君堂民间传说中,当年跟

随太上老君修炼的两个小道童,其名恰恰为金角和银角。小小的平山乃至周边地区,能有这么多与名著《西游记》相吻合之处,实在难得。

生殖崇拜是古海州地区先民们为扩大自身生产而衍生的一种民俗活动。拜石祖是这种活动中较为普遍的一种。在平山,就有这种石祖遗存。它是两根状似成年男人外生殖器的石柱。其中的一根,高 1.66 米。上部长 0.43 米,外径长 0.97 米,上细下粗。下部为略呈方形的柱体,八面,棱角浑圆,高 1.22 米。另一根其形制和大小与前一根略有不同,较粗大,其造型不如前一根精致。当地人称这里的石柱为石干妈。对娇生惯养的小孩,父母都会将其带到石柱面前拜一拜,认石为母,以求平安。这大概就是石干妈一名的由来。对于不孕妇女,母亲或婆婆都会嘱咐其在正月初七或其它逢单的日子,在凌晨天刚放亮的时候,趁路上无人,悄悄来到石祖前,用手摸石祖的头,或用内衣罩一下石祖后,然后不调头赶回家中。更简单的磕个头也行。这些都是为了求石干妈赐子。据市博物馆、文管会专家鉴定,此石祖距今已有 6000 年。它折射出我们的祖先在这里繁衍生息的身影,是难得的早期文化遗存之一。

民国 35 年正式成立连云市,平山归第二区墟沟,为墟沟 3 个乡镇之一(另两个为墟沟、西石)。后第一、第二区合并,平山乡依然存在。这是平山地区历史上首次出现的乡镇。其范围东起墟沟烟墩山,西至平山,含墟沟大巷、南巷以及 310 国道以南的广大地段。1947 年,平山乡为墟沟和宿城两乡所取代。1948 年,连云港解放,成立新的连云市,辖东港、宿城、墟沟、连岛 4 个区,平山归墟沟区,建置依然为乡。此时平山乡的范围为,帽盒岭大沟以北,连同西小山,还有今天院前村的范围,乡驻地在南巷。1952 年连云市改为连云区,1953 年后平山乡两归云台区,一归连云港办事处,但平山乡这个建置一直没有变,维持至 1958 年 3 月。此后,一直为平山大队、平山村。

责任编辑 张伟敏



# 黄九堰名称溯源

蒋金明



1985年,连云港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选址黄九堰

1984年,连云港市被国务院批准为全国首批对外开放城市后,积极筹建对外开放的开发区。开发区管委会具体地点,就设在中云台地区的黄九堰。这里为什么叫黄九堰呢?要从原五羊湖和古捍海堰说起。

黄九堰南面是中云台山,北面是北云台山。据《云台新志》记载:1836年前,两山之间是海。东起大板桥,西到虎山西,东西长二十多里,南北长四至五里。在中云台山北有五个羊形的石头,即五羊石。后来云台山人就把北云台山和中云台山之间的海面叫“五羊湖”。

清《嘉庆海州志》载:“万金坝,去东海城东北七十里。南北长四里,东西阔三丈。隋开皇五年(585年)筑。以其利民者多,故名。后废。”又载:“隋开皇九年(589年)筑西捍海堰,南接南城的谢禄山,北接石城山(指墟沟),南北长六十三里,高五尺。”南城,是原云台山地区的县城。从南城到北城墟沟,必经过五羊湖。从隋开皇五年到开皇九年分别筑万金坝与一道海堰,说明



隋朝开皇年间,五羊湖底是干涸的,只有海底干涸才能筑五尺高堰。

到唐开成四年(839年),有日本圆仁和尚来唐求法,他从高公岛上岸,经宿城,过虎口岭、白果树村“取盐处”,去东海县南城。他在日记中这样写到:“自此山头,有陆路到东海县,只是泥深路远。”圆仁和尚记录说明当时五羊湖底也是露出来的。

唐朝后期至宋朝,海水上涨,五羊湖又成波浪滔天的海面。

到明朝,湖底又一次呈露。清《嘉庆海州志》载:“明洪武二十七年,重筑(万金坝)。弘治十六年,……大修。”明朝期间多次在五羊湖中修堰、桥或万金坝等。明朝中后期海水逐渐上涨,到1710年清朝康熙年间,海面升高达最大值。而后,海面又逐渐下降。据《云台新志》记载,从1710年到1836年,五羊湖又经过126年,已为平地。

五羊湖在海水退出后,在今中云办事处江庄村与云山乡白果树村西留下一片水面,地方人称“西湖”。“西湖”东有条古堰基,老百姓称“石堰”,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云山乡农村搞水利建设,在石堰位置挖出许多山石,石上长满蛎壳,充分证明这里是古老的石堰。但西湖东有石堰,西部有黄九堰,但不知这道堰具体走向。中云乡范庄村张祖才先生讲,解放后,从黄九堰到墟沟平山,不是今天从黄九堰直去平山的路,而是从黄九堰直向平山村东的黄墓山根(黄墓山根是平山村与老君堂村交界处),然后再折向西达平山。他同时说,日本侵占连云港地区后,就在墟沟过平山后向东至黄墓山根的路是大车路,从黄墓山根向南的路上筑石子路,石子路经过黄九堰,又经中云隔村向南。

从黄九堰向东北黄墓山根转向西才至平山今中山路上。为什么原来路要这样拐弯呢?江庄村96岁高龄的金老爷讲,在日本人未来之前,去墟沟要经黄九堰到平山东,走黄墓山根再向西才达平山南北的路口。黄九堰到黄墓山根是烂泥路,车路非常难走,人要经常帮着推车。

《云台导游诗钞》作者张百川在该书“五羊归帆”一文中这样写到:“自咸丰元年,商人挑半边河运盐,湖水出东入海,湖遂涸。”清咸丰元年(1851年),垣商为了把小板桥东部盐运出,穿越原五羊湖底,挖开湖底古老堰基,边行船边扒捞河道,后来把这条运盐扒成的河叫半边河,即今运盐河的前身。小板桥东部产出海盐,垣商把海盐运往大浦,然后再销售到江南。

盐商扒开“西湖”东部古老石堰基,“西湖”水向东流入大海。西部的堰基被扒开,海水流向西海州湾。五羊湖彻底干涸,留下空名。盐商扒开湖底堰基,其中东部堰基叫石堰,前面作了介绍。那“西湖”西的古老堰在哪呢?

历史上隋朝在此筑过“西捍海堰”,即南城到北城(墟沟)之堰,这堰存在250多年,到唐朝中后期海水上升古堰被淹没。到明朝又筑万金坝。当湖水退出时,古堰或坝基会保留下来。干涸后湖底中的古堰基略高于附近湖底,古堰外的湖底至少长期是淤泽地,行人南北初行时必然走于古堰基上,走的人多了,就出现黄九堰至平山的拐弯路。盐商在1851年扒开“西湖”西堰运盐时,这“西湖”西堰也应是前面所说的黄九堰至黄墓山根方向的堰。

另外,笔者以前听中云乡文化站老站长王继澄说过,黄九堰路西有“万金闸”碑。经他多处走访,有人告诉他,“万金闸”碑在原中云乡新光村三队牛房屋上,已做成门石了。经过他努力,看到碑的原貌。碑文是:“万金闸”。下面落款是:“光绪八年立”。光绪八年,即1882年。光绪八年的“万金闸”碑竖在黄九堰路西旁,即今豫苑新村的东南角,新光路与港城大道交汇点的西北角。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云乡新光、范庄、焦庄、胜利等村人大多看过。此处为什么有“万金闸”呢?说明此处有明朝时期曾是“万金坝”范围。

海水后退,我市新坝地区的海面水位在同时下降。新坝是原苏北重要盐产地之一,到1882年,新坝因海水下降,原盐滩无法取海水而被迫到新地造



滩晒盐。今天市开发区的出口加工区向北至西墅以及向西至塔山、猴嘴一带,最先来这里造滩产盐者,大多数是那个时期的新坝人跟着垣商来造滩产盐的。根据这一信息,黄九堰旁的万金闸应是来这里造滩产盐的垣商所立。据新光村村民回忆,所谓“万金闸”碑,就是在原建闸中的一块普通长条石,碑面未经加工,只是刻两行字。在这里建闸,主要是调控海水。海水涨潮时,开闸向河里进海水,利于取海水晒盐。在造滩产盐同时,于光绪八年,即 1882 年筑“万金闸”,并立碑纪念。

今天连云港出口加工区向北至平山根,是原来造滩产盐地,叫“黄圩”。连云港地区造滩产盐地叫“圩”。晒盐者是一家人,或是一个家族人。所以原来造滩产盐的圩子,就是某姓氏名称谓。

1851 年垣商为运小板桥东部大量的盐,从五羊湖底扒捞成半边河行盐船,半边河从东向西行船同时穿过东部古堰——石堰和西部的古堰基。东西两处古堰基,是历史上的南北交通要道。交通要道被切断,南北行人十分不便,河道行船和旱道行人成了矛盾,随着社会发展,矛盾越来越突出。东部石堰处安排跳板利于行人,后来名子叫“江二跳”。西部堰处是北云台山地区和中云台山、南云台山地区及海州、新浦等地的重要路道。路道被行船道切断后,因无固定人管理,谁过河,就抱些附近的芦苇筑堰行走,每年要用大量芦苇,行船时又要扒开,船过去后又要筑成堰。后来用跳板行人,常年受到船浪撞击,受损严重,河口被开宽,跳板很快不够长,木材又缺乏,后来又回到用草筑堰方法。到 1882 年,附近黄圩有人晒盐,就改用固定人管理。西部产盐地黄圩工人黄汉清,家靠行船路口近,只是一河之隔,生活方便,筑堰又有力气。到黄汉清管理时有了麻袋,麻袋里装少量沙,行船时把麻袋搬开,船过去后,又将沙麻袋打成堰,再让人行走,这样行船时扒堰,行人时筑堰。扒堰筑堰劳动十分苦累。黄汉清在黄圩黄姓家庭中排行第九,社会上人一般称谓他黄九,久而久之,这个地点成了“黄九

堰”。

到了清末民国初,社会经济发展很快。北部墟沟、连云与南部云台山地区、新浦、海州物资交流频繁,加上运输工具的发展,原来人工筑堰已不适应社会发展需要。为了解决好行船与行车矛盾,将南北行人堰,改用古人管理城门吊桥的方法。将人工筑堰处安装吊桥,南北行人及车辆在吊桥上通行,在盐船行驶时,吊桥提起,运盐船通过。车、船行驶十分方便,也解放了生产力。

1948 年 11 月 7 日,中云江庄村的金大爷见证黄九堰吊桥被烧之事。那天,金大爷从江庄家去中云隔村走亲戚,走到中云魏庵村附近时,听人说,要打仗。他急忙跑回家,听村里人说,八路军(实际是解放军)已从中云山顶走过,部队已进驻范庄。看守黄九堰的国民党盐警想封锁住吊桥,将吊桥浇上汽油,点火烧着,企图阻止解放军向连云港进攻。

解放后,人民政府在黄九堰修筑大桥,从此南北行人及车辆和桥下东西运盐船畅通无阻。

(作者单位:市开发区中云街道办事处)

责任编辑 张伟敏



# 连云港历史沿革史话(六)

## ——秦汉时期连云港地区的郡县行政建制(上)

刘凤桂

### 秦代朐县的设置和属郡变化

公元前 221 年,秦始皇结束了战火纷飞的七国争雄局面,统一中国,彻底废除了西周以来“封诸侯,建藩卫”的地方行政制度,在全国范围内普遍实行郡县制。这一制度其实在秦始皇统一中国前,中原各国就已经开始实行某种程度上的中央集权式的郡县制了。秦朝的郡县制是对统一前各国实行郡县制成果的整合、提升和完善。

秦始皇设郡县,将其归于高度集权的中央政府领导之下,郡守的任免权、调度权由皇帝掌握。中央在皇帝之下设左右丞相、御史大夫(右丞相兼)、廷尉,称“三公”,分别协助皇帝管理政务、军事、监察、税赋等。地方行政机构的郡县基本上仿照中央机构,置最高长官郡守,掌一郡的全部事务;置尉辅佐郡守,并掌握全郡军事;又设监御史,监察郡县官吏的行政、司法工作。一郡之内分为若干县,万户以上设县令,不满万户设县长,掌管全县政务,受郡守节制;设县尉掌管全县军事;设县丞作为县令(长)的助理并掌管司法裁决。一县之内有若干乡、里,每乡设三老掌教化,嗇夫掌司法和税收,游徼掌治安。乡以下有里,里设里正和里监门等小吏。另有亭,设亭长,是最低级的管理机构。由此观之,有秦一代,建立的是这种大一统的从中央到地方的严密的封建

统治网,“历代皆行秦制度”,这种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制度,对我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连云港地区秦代先属薛郡(治薛城),后属郯郡,称朐县。

这里讨论一下秦朝的薛郡与郯郡的设置以及与后来东海郡的关系。

目前,一些研究文章大多以地方志书来标定秦代连云港地区的属郡,称秦代属“薛”或“郯”。所本为已知最早的地方志书明《隆庆海州志》云:“海州,本春秋郯子国地。秦始置朐山县(朐山,误也,应为朐,称立朐山县乃北周武帝建德六年,即公元 574 年事——笔者),尝立石朐山,刻曰:‘秦东门’,属薛郡,后分为郯郡,汉改属东海郡。武帝置刺史时隶徐州。”清《嘉庆海州志》也基本沿袭此说。而明清州志所本均出自《汉书·地理志》“东海郡”班固“自注”。《史记》无“地理志”,朐作为县级行政机构见诸文献在《史记·秦始皇本纪》——“始皇三十五年,立石东海上朐界中,以为秦东门。”又据《太平寰宇记》,海州(即古之朐县):“七国时属楚,秦兼六国以为薛郡,后为郯郡。”在秦灭六国统一中国的始皇二十六年(前 221 年)之前,曾在二十三年(前 224 年),将原齐地分置齐郡和薛郡。此见《水经·泗水注》:“始皇二十三年(前 224 年)以为薛郡。”至于分析薛为



郯,清代著名学者洪亮吉认为“分薛为郯,即在二十六年并天下之后也。”按此推断,薛郡未析出郯郡只3年时间。析出郯郡后又过了9年,至始皇三十五年(前212年),秦始皇最后一次东巡,从会稽渡长江后继续北上去琅琊。过朐县时,“立石东海上朐界中,以为秦东门。”《史记·秦始皇本纪》不提朐为“郯”地之属,而直言“东海上”,应该说改郯郡为东海郡就在这一年,也就是说郯郡名号存在9年(前221—前212年)后即改称东海郡。谭其骧先生在《简明中国历史地图集》“秦时期图”中只标出“薛郡”与“东海郡”而无“郯郡”,并说:“初并天下全境分置三十六郡,其后并五岭以南南越地,置南海、桂林、象三郡;北取匈奴阴山地置九原郡;又陆续分析内郡,至秦末,除都城咸阳(今陕西咸阳市东北)附近关中平原为内史辖境外,见于《史记》《汉书》《续汉书》《水经注》等记载的秦郡共四十八郡。”所谓“分析内郡”自然包括从薛郡析出郯郡之事。他在《西汉政区地理》中说:秦“东海或称郯郡,以郡治得名”,这就否定了《汉书·地理志》所谓“东海郡,(汉)高帝置”及其之后诸家地理书袭称西汉置东海郡之说,而将郯郡改名东海郡的时间界定在秦代。

谭先生的定论还可以从楚汉相争时期的史料记载中得到印证。如《史记·陈涉世家》中“陈王初立时……将兵围东海守庆于郯”;《絳侯世家》中“项籍已死,因东定楚地泗州、东海郡,凡得二十二县”;《项羽本纪》中“项王已定东海,来西与汉俱临广武军,相守数月”等,如果没有秦末郯郡改称东海郡之史实,太史公何以在西汉大统未立的时间段里直称东海郡呢?

关于秦代的赣榆。始皇二十三年(前224年),将齐地分析为齐郡和薛郡,今赣榆西部地区为薛郡之地,有祝其、利成二县。东部地区秦代已称“赣榆”,以1979年陕西临潼秦陵“刑徒墓志瓦片”中“赣榆柜”“赣榆得”两片可证。始皇二十六年(前221年),秦初并天下,赣榆东部地区属琅琊郡,西部地区属薛郡,西部地区后来于始皇三十五年(前212年),改属东海郡。赣榆地区在春秋时建有莒国的陪都渠丘邑,即“大小莒城”,汉代称“计斤城”,今遗址尚在。另有祝其国,春秋末灭于莒,后莒又灭于

楚。秦灭楚后祝其由邑改为县。

关于沐阳。秦汉时期无沐阳称谓,秦并天下后,今沐阳地区有厚丘、襄贲二县。其西部地区可能归入泗水郡,北部地区归兰陵郡,东部地区归郯郡—东海郡。其中厚丘还应包括今东海县安峰、房山两个乡的部分地段。

这样看来,有秦一代连云港地区所属之郡依序主要为薛郡——郯郡——东海郡。另有赣榆东部属琅琊郡、沐阳西北部属泗水郡。

### 西汉时期的连云港地区县级建制及属郡

#### (一)西汉时期各县的今地域境

“汉承秦制”,说的不仅是中央集权的政治制度延续自秦代,而且在郡县设置上也基本承续了秦的行政区划遗产,并在这一基础上有所整合和创新。《汉书·地理志》是我国第一部历史地理著作,它比较集中地排列出西汉时期的政区建制,是研究秦汉时期地方历史沿革不可或缺的主要文献资料。我市自明隆庆之后的许多地方志书在体例上皆受其影响,涉及到的汉代历史地理史料也多取自该《志》。

西汉武帝元封五年(前106年)始设部刺史,除近畿七郡外,分全国一百多个郡国为十三部,每部设一刺史,掌刺察部内官吏与强宗豪右,定为常制,以州名为部名。征和四年(前89年),又设司隶校尉,掌察举京师百官与京畿七郡。这样,全国共十四部州。以《汉书·地理志》,结合《尹湾汉墓简牍·东海郡属乡县吏员定簿》考察,今连云港地区属徐州刺史部分察的东海郡辖有:朐、海西、利成、祝其、东安、曲阳;襄贲、厚丘、建陵、阴平诸县和琅琊郡的赣榆县。另有考古发现而有待争议的柜(音ju)。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历史上今连云港地区域境称“海属地区”,又称“海赣沐灌地区”,即明清时的海州及其隶属的赣榆、沐阳两县域境。今灌云、灌南两县乃民国初从东海县(原海州)分治出去的灌云县(不含云台山)。此四地历史上同属一个在经济、政治、文化上融为一体的文化圈内,故在讨论连云港地区秦以后至明清的建制沿革时,我们将沐阳包括进来,尽管今沐阳的行政区划不在连云港市范围内。



现将上述西汉各县的今地域境略述如下:

朐县地域境:包括今连云港市区,含海州区、连云区以及分属于这两区的云台山地区。

海西地域境:包括今灌云、灌南两县全部,还包括盐城市滨海县以北部分、响水县的大部分;淮安市涟水县涟河以北的部分。

利成县地域境:包括今东海县北部羽山以北和山东临沭县东部。

祝其县地域境:包括今赣榆区西部。

襄贲、厚丘、建陵、阴平四县地域境:大部分包括在今沭阳境内。其中建陵县由襄贲析出,阴平县由厚丘县析出。

东安县地域境:包括今东海县罗庄古城以北,羽山以南地区。

赣榆县地域境:包括今赣榆区东部地区,含汉赣榆盐仓城遗址以南至连云区墟沟北固山以北的近海乡镇。

## (二)东海郡朐与琅琊郡柜的分界

据连岛发现的两处“西汉界域刻石”,一处是在羊窝头(1987年发现),一处是在苏马湾(1996年发现)。两刻首句皆曰“东海郡朐琅琊郡柜”,这个“柜”从刻石行文上看,应该是一个与西汉时县级行政建制的朐对等的地方行政单位。但考古发现出土的《尹湾汉墓简牍》所列东海郡、琅琊郡无柜的名录;《汉书·地理志》琅琊郡的柜县位置在今山东胶南县以北;清《嘉庆海州志·疆域》也未见收录。有关柜与朐的分界,今以刻面较为清晰的苏马湾刻石释文观之:“界因诸山以南属朐,水以北属柜。西直况其,柜与朐分,高(顶)为界,东各承无极。”可以判断是以东连岛鹰游山最高处为地理坐标,“诸山以南属朐”则当包括郁州岛(今云台山)的全部山地均属西汉东海郡朐县,“水以北属柜”,则是以水为界,北为琅琊郡之柜。若依照《汉书·地理志》“琅琊郡柜”班固自注:“根艾水东入海,莽曰袞同。”柜县的地理位置应该在西汉琅琊郡北境,即今山东胶南县北,显然与连岛界域刻石所标的柜的地理位置相悖。查阅谭其骧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西汉时期全图》这个“琅琊郡柜”与“东海郡朐”之间隔有琅琊、海曲、赣榆三县,何以直接与东海郡朐县在海上划界?这是

一个困扰我市学者多年的问题。

其实这个问题还是要从王莽改制说起。公元9年,王莽篡汉,改元年号“始建国”。这个新朝的“新”其实是复古改制,其重要内容之一就是仿《周礼》对西汉的一些名物制度进行所谓“改革”。王莽一上台,便“遣武威将军王奇等十二人班符命四十二篇于天下”“奉符命,齎印绶,王侯以下及吏官名更者”“定诸国邑采之处”。因所谓“符命”而任意改变中央和地方的官制和官名,频繁变更地方行政建制及名称。始建国四年(公元12年),王莽欲迁都洛阳而笼络大臣,“莽至明堂,授诸侯茅土。”(王莽以《禹贡》和《周礼·职方》为蓝本,按公侯伯子男五等爵分赐“采任”。为此需要对汉初以来的很多郡、县名称加以变更,以合所分采任之“符命”。如“改郡守曰大尹,都尉曰太尉,县令长曰宰”,等等——见《汉书·王莽传》);又如改东海郡曰“沂平”,改琅琊郡曰“填夷”,改沛郡曰“吾符”(见《汉书·地理志》班固自注),等等;郡治属下的县名改得更多且复杂,仅东海郡38县就改名25个县,琅琊郡51县改名16个县(见《汉书·地理志》)。这一举措的危害在于造成地名识别上混乱,实际执行起来很困难,连朝廷下诏书都得在新地名上加注原来地名;至于“定诸侯邑采之处”,因“以图簿未定,未授国邑,且令受奉都内,月钱数千,诸侯皆困乏”(《王莽传》),故也是失败之举。所封五爵人等只是在“都内”长安领取“月钱数千”的采任,人却无封地可到。

王莽改制造成的后世历史地理研究之纷扰于此而起,成为我国历史地理学中争议颇多的一个研究领域。我市连岛界域刻石中出现的“柜”地,就是一个需要争议的话题,本文暂且不论此事。

(作者单位:连云港市朐海书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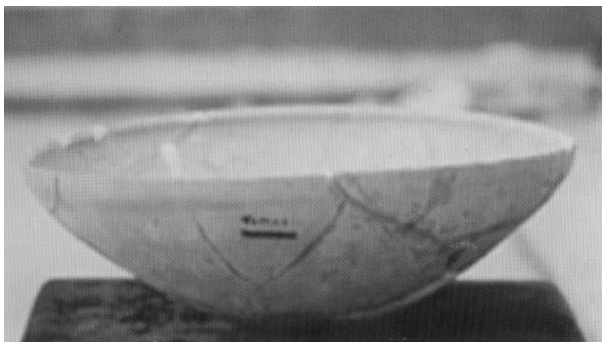
责任编辑 邱仕明



# 试解大伊山 石棺墓十大谜团(下)

黄正明

六、大伊山石棺墓区中为什么死者脸盖红陶钵或红陶盆？红陶钵底部的小孔有什么含义？



红陶钵

大伊山石棺墓区有 17 座石棺墓中用红陶钵或红陶盆盖在死者面部，有的陶钵底部有小洞。

《中国考古学通论》(孙英民、李友谋主编，河南大学出版社 1996 年版，下同)中说：“在氏族社会，对死者的埋葬，是依据氏族的习俗制度进行安排的。”“原始宗教意识还反映在葬俗上……棺盖凿孔，是供鬼魂出入的通道。”

灌云县博物馆副馆长陈龙山认为，红陶钵盖面，是连云港地区古代的一种葬俗。它带有一定原始宗教色彩，可能还与先民纯朴道德观念有着一定的关系。先民们认为直接用泥土盖在亲人面部，玷污了亲人的口、耳、鼻、目，是对祖先和亲人的不尊重，故而用陶钵或盆盖在死者面部。至于陶钵底部打小洞，纯属原始宗教的表现，即灵魂出入观。

原连云港市博物馆馆员丁义珍、刘凤桂则认为，红陶钵盖头是初民对天对祖先崇拜的表现。并与战国时的冪目、汉代的玉面罩以至今日苏北民间死人面部遮着蒙脸纸等相联系，推理它们是陶钵盖面习俗的延续。

笔者认为上面几位学者的解释是可以成立的，从用红陶钵盖死者之面，到现在的白纸蒙在死者脸上及身上，以及在死者断气之前赶忙将早就准备好的衣冠鞋袜换穿在其身上的习俗，我想还应有让死者干干净净、一尘不染进入另一个世界的含义。红陶钵底上打个小孔，到现在还有不少人在死者骨灰盒下葬前，或用水泥对墓合缝时，都设法留个小孔，说是让死者灵魂出入的，都是灵魂不灭论的详现。

七、大伊山石棺墓距今约多少年呢？该遗址属哪一种文化类型？

众所周知，陶器是文化分类的重要标志。从其制作方法和工艺特点可判断其距今的年代。《中国考古学通论》中说：“我国各地所出的年代较早的陶器，都有共同的特点。制法上都是手制，有的采用了泥条盘筑法。陶色以红陶为主，灰陶还少见。”“各种器物的造型不复杂，制作相对粗糙。器表主要刻画或压印纹饰，未出现彩绘。”大伊山石棺墓中出土的陶器的特点与此早期陶器相似，一般为红褐色，其制作特点是手制。瓶、壶、罐类器物都采用泥条盘筑，素面无纹饰，少数有指甲纹、划纹和附加堆纹等，明显早于大汶口文化和龙山文化中的陶类制品。大汶口文化的陶器色彩多样，有红、灰、黑、白等



色;有纹饰,如花瓣纹、圆点纹、菱形纹、带状纹、八角纹等。龙山文化的陶器普遍采用轮制,胎薄而均匀,造型规整。大伊山石棺墓中出土的陶器中,最有制作特点的是釜形豆,其制作过程与形状,都与淮安青莲岗文化中的陶器特点相似,与山东滕县北辛文化遗址出土的罐壶等陶器比对,不论是器型上,还是火候与质地上都如出一辙。从比较学角度来分析,大伊山石棺墓的年代与青莲岗及北辛文化年代相当。北辛文化年代早于大汶口文化,约距今7300—6400年。

中国考古学通论》(孙英民、李友谋主编,河南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中说:“北辛文化遗存,包括江苏淮安青莲岗、邳县大墩子下层、连云港二涧村、阜宁梨园、山东王因下层、泰安大汶口下层和滕县北辛遗址。”大伊山石棺墓遗址距淮安青莲岗、滕县北辛都不远,距连云港二涧更近,因此可以说,大伊山石棺墓属北辛文化类型最为稳妥,其年代约距今6500年以上。

#### 八、大伊山石棺墓为什么有相互叠压和打破现象呢?

这种现象与当地的风俗习惯有关,《报告》介绍,石棺墓群中,有三组两棺叠压,两组各有一棺打破另一棺现象,这是后葬的叠压或打破先葬的。即后死者的墓穴开挖时,下面已有棺了,不管是否发现,都未另选别处,把后死者的石棺建在先葬石棺之上,从而形成叠压;还有一种情况,是后死者的墓穴刚开挖,就发现新开挖墓穴范围内,有一部分被先葬石棺占着,但仍未另选别处或向旁挪移位置,而是将原有石棺拆除一部分,将后死者的石棺建完整,称之为打破现象。例如:M56号原始氏族石棺是被M59号汉代石棺打破的。这种现象与葬俗有关,人们认为墓穴开挖了就不能再挪位或另选地方,否则是不吉利,会招致亲人生命凶险。现在社会上还有这种说法。

#### 九、大伊山石棺墓中死者,属于哪个族系?

关于大伊山原始先民的族属问题,陈龙山副馆长说:“我们虽然不能说文化共同体就必然和历史上的古民族或古国一一对应,但它们两者之间互有联系应是不可怀疑的。”如仰韶文化即是炎黄部落文化;北辛文化、大汶口文化即东夷部落文化,即属东方民族,亦称东夷族。大伊山在东夷范围之内,因此可以说大伊山石棺墓中死者是东夷族。

若再向前推,徐淮地区的东夷人都属“沂源人”的后代。相关资料介绍,距今约十万年前后,聚居在

沂蒙山区的原始人,因人口越来越多,该山区的兽类维持不了人们的最低生活,常受饥饿的威胁。于是他们开始走向平原和海边,其中一部分逐渐散居到鲁南苏北一带,史学家将其称为“沂源人”。所以,我们连云港地区包括大伊山一带氏族先民的祖先也是“沂源人”。

#### 十、大伊山石棺墓出土的红陶钵外底部刻画符号有什么含义?

大伊山石棺墓出土的红陶钵,其中五件的外底部刻画着不同的符号(如图A、B、C、D、E)。(表一)

关于这几种符号的含义,考古界有多种猜测和说法。笔者认为,应当重点从原始丧葬史、古代葬俗的演变、古文字、太阳崇拜和灵魂不灭观念等方面去探讨。

##### 1. 关于原始丧葬史及葬俗的演变

《葬法》中说,远古时,“上世尝有不葬其亲者,其亲死,则举而委之于壑”,即弃尸法,逐步过渡到用柴草之类将尸体掩盖起来。



表一

| 正楷   | 甲骨文 | 石鼓文 | 金文 | 小篆 |
|------|-----|-----|----|----|
| 草    | 𠂔   | 𠂔   |    | 𠂔  |
| 葬    | 𠂔   |     |    | 𠂔  |
| 墓(莫) | 𠂔   |     | 𠂔  | 𠂔  |

表二

| 正楷 | 甲骨文 | 石鼓文 | 金文 | 小篆 |
|----|-----|-----|----|----|
| 行  | 𠂔   |     | 𠂔  | 𠂔  |
| 家  | 𠂔   |     | 𠂔  | 𠂔  |
| 冢  |     |     | 𠂔  | 𠂔  |

表三

表一二三

仍有被野兽钻进去撕啃尸体现象出现。于是,坚固经久的石棺葬法先后在很多地方出现了。大伊山石棺墓是全国已发现的年代最早的一处,其中还有用红陶钵、红陶盆将头脸盖上的。

从直观上看红陶钵外底部的五个刻画符号,绝大多数像树枝和杂草。证明大伊山地区在采用石棺墓葬法之前,也有采用草盖葬法。后来采取石棺葬和红陶钵盖面葬法时,先民们还是不忘草盖葬法这



个传统葬俗，在制作专供盖在死人面部的红陶钵时，便在外底部刻画上简单的树枝或杂草图案，示意石棺葬和红陶钵盖面葬法替代草盖葬法，是从草盖葬法演变而来的。

## 2. 红陶钵底部的刻画符号与相关的古文字对比分析

大家都知道“书画同源”。《书法精论》中说：“盖文字之始，莫不生于象形。”现在就来看看红陶钵上的刻画符号与丧葬相关的古文字的渊源关系。通过检索，觉得与丧葬有关的字是“草、葬、墓”三个字。下面是这三个字的字形演变过程，其中“墓”与谐音字“莫”义相近。（表二）

从（表二）中可以看出，“草”字的三个甲骨文写法都像草形；“草”字的石鼓文写法，“葬”字的小篆写法，“墓（莫）”字的金文、小篆写法的共同特点是字的四周笔画都是“草”，说明“草”与墓葬习俗、原始葬式有关，特别是与原始草盖葬式相似。

《汉字形义演释字典》解释“葬”字的小篆写法说：“上下是草，中间是死，死下是一，指地面。合起来，人死后安放在草丛中，表示安葬。”

“草”的石鼓文写法，“墓（莫）”的多种写法，又非常像红陶钵上图 A 刻画符号。图 A 的四根代表性草的梢头带刺，代表四周都堆上带刺的荆条、树枝，中间的圆圈像是藤蔓圈扣着。与“草盖葬法”的渊源正好吻合。也可以说，红陶钵上图 ABCD 四个刻画符号，都是源自草盖葬习俗。

## 3. 先民们的太阳崇拜观念在红陶钵及古文字中的体现

红陶钵呈半圆形，覆盖在死者面部，刻纹朝上，图 A 的中间圆圈也可解释为日，与“草、墓（莫）”中间的“日”有渊源关系。《汉字形义演释字典》中对“莫（墓）”字的形及本义解释是：四周都是草，中间的“日”表示太阳。”《说文》：“莫，日且冥也。从日在草中”，“莫”的本义指日落的时候。这样，“莫”也可比作人刚死去。原始人将死者埋在草丛中比喻为日落在草丛中，这是人们崇拜太阳、尊敬祖先的一种表现方式。

## 4. 先民们的灵魂不灭观念在红陶钵刻画符号中的体现

红陶钵刻画符号 C 和 D，既可看成堆起的树木、杂草。更可以看成是交叉的路。特别是图 C，十字形交叉线各三根，每根线上有一段虚线，即以小点连续成线，可想象成灵魂的足迹，实际上又是古象形字“行”的形象。《汉字形义演释字典》中对“行”

的字形及本义是这样说的：“甲骨文‘行’字像十字路的形状，金文和小篆与甲骨文写法相似。”文字专家罗振玉曰：“‘行’的甲骨文写法‘像四达之衢，人所行也。’‘行’的本义是道路。’‘行’可引申为‘出行’。（表三）

先民们认为人死了灵魂还在。在红陶钵底上打个小孔，还刻画出“行”符号，当红陶钵覆盖在死者面部时，小孔和刻画的“行”字符号的位置正好朝上。这正好表示死者灵魂可以从小孔进出行走。这是人们的灵魂不灭观念在陶钵刻画符号中的具体而生动的体现，也是“书画同源”理论的很好例子。

## 5. 红陶钵底部表示家或冢的刻画符号

红陶钵刻画符号 E，既无草，又无日，像一个远古时代圆形小房子。笔者分析，可能是“家”或“冢”的刻画符号。笔者查阅了“家”和“冢”的古文字写法，进行比对。（表三）

“家”。《汉字形义演释字典》中解释：甲骨文、金文和小篆的写法像屋子里关着猪形。也有学者解释为屋中有风的。《说文》：“家，居也。”并说：“家，最先指养猪的地方，因猪是人养的，也住有养猪的人，稍后就指人们生活居住的处所。”红陶钵底部的图 E，更像家门前用树枝挡着，防止野兽入侵。下半部的线条画成虚线，表示是可以挪动的树枝，不是固定不动的。

“冢”。《汉字形义演释字典》解释：金文外面有蒙覆义，里面有二足被系的猪，这里表示隆起物。合起来，表示坟墓。《说文》：“冢，高坟也。”引申泛指一般坟墓。

红陶钵上的刻画符号 E，和“家”“冢”二字的古文字写法形象相似，可以说这个符号就是表示坟墓，也可说是死者的家。还可以说“家”“冢”二字是从 E 刻画符号的形象演变而来的。

大伊山石棺墓南边 300 米处，是大伊山的两个山峰，名为棺材山和龟腰山。两山交界处及龟腰山上、山南卧龙岗，有很多古星相石，面积之大、数量之多，全国罕见。可以说，大伊山是我国东部沿海一带原始人生活的典型地区。星相石是原始人文化活动的珍贵痕迹，石棺墓又是原始丧葬文化的国宝，加速对大伊山原始人聚落区的开发建设，对发展灌云旅游业，发展灌云经济都是十分有利的。

（作者单位：灌云县杨集文化站）

责任编辑 邱仕明



# 当路王氏及其他

杨春流

有专家称，家谱和方志、正史构成了中华历史大厦的三大支柱。就其内容而言，家谱是中华上下五千年文明史中最具有平民特色的文献。家族渊源和世系图表是家谱中最为重要的内容，这是当代人寻根问祖的重要资料。家谱是我国传统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其中蕴藏着可资借鉴的优秀传统文化资源。“只要我们用科学的态度对家谱加以研究“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古为今用，挖掘传承，对于增强中华各族儿女的凝聚力

和向心力，培养文化认同感、归属感和自豪感，对继承传统文化，弘扬时代精神，维护社会稳定，构筑和谐社会必将起到正面的推动作用。”（李立刚《家谱就像“寻根路线图”》）

家庭是家族的一员，如果说家庭是社会和谐的细胞，家族则是社会和谐的基石，对家谱的研究很有意义。本文就当路王氏史及其当路地名语源作浅论，抛砖引玉，希望有更多更好的研究家谱的

文章问世。

## 东海当路王与琅琊临沂王的族脉渊源

一是地缘相近，族脉相亲。自东周受姓后，周灵王太子晋便是琅琊王两支的祖先。东海当路王是其中一支。这一支以王尊为族祖，另一支是王吉的后人。

琅琊郡于东汉至隋治临沂，近半个世纪，且朐地（今海州、东海）历史上也曾两次为琅琊郡治所，一次在越王勾践灭吴后，于公元前469年迁都琅琊，治朐（今海州），至前379年还于吴，长达90余年（另一说法，前603年至前245年迁都于朐，历八主），还有一次在南朝梁置琅琊治朐县（今海州），从502年到557年，历时50余年。

朐与临沂本是近邻，加之两地先后又同为琅琊郡治，其当路王顺理成章地为琅琊当路王。童辉主编《中华姓氏大全·王》所载：隋朝初期，原仕于南朝琅琊的王氏被分别迁到关中、河北和河东（今山西）等地。此琅琊王氏指的就是当路王氏。

二是同朝为官，前任后继。两汉时期，王姓得到了迅速发展，相继出现了太原和琅琊两个郡望。王吉、王尊都在汉朝为官，从汉昭帝、汉宣帝、汉元帝到汉成帝，先后历经四代皇帝，王吉年长于王尊，历汉昭帝、汉宣帝两朝，王尊继后历汉元帝、汉成帝两朝。王吉、王尊又都任过谏议大夫，又都曾为盖州刺史，只是王吉在前，王尊继后。据《华阳国志》载：王吉任盖州刺史期间，巡查所属部域九折阪，夏天还结有厚厚的凝冰，冬天则无比寒冷。他感叹道：“奉承先人留下的身体，为何屡次冒这种险。”后来称病离开。继任者正是王尊，他也去九折阪，知道这是王吉所畏惧的道路，命属吏：“继续前进！王吉为孝子，王尊为忠臣。”可见，他二人之关系。再说晋惠帝元康年间东海王司马越执政，与王家关系不一般，琅琊人王祥受聘出任徐州别驾时，管辖沂海地带，期间“教化大行”故而在临沂流传“海沂之康，实赖王祥，邦国不空，别驾之功”的歌谣。可见，东海与临沂关系之密切。

三是族分两支，各领风骚。东海琅琊王出道较早，秦末泗水人王陵汉初（前129年）任右丞相，三国魏时东海郡郯人王朗任宰相。



西晋是琅琊王鼎盛时期。先后出了王戎、王衍、王导、王珣、王弘等五位宰相,其中王导、王珣、王弘是祖孙三代宰相。由于王导在朝中的显赫地位,加上王氏家族与谢氏、庾氏、刘氏等士族有姻亲关系,琅琊王氏成为东晋初期王、谢、庾、刘(或王、谢、袁、肖)四大家族中最有势力的特殊士族。据《晋书》,琅琊王氏后代可考的有官位的多达50多人,若加上未能考知的如王处季、王舒等就更多了。王氏家族在建立东晋过程中发挥了很大作用,所以有“司马与王共天下”之说。

西晋东迁时,琅琊王随司马睿逃离故土,王吉后人王羲之也随父王旷迁到建康在繁华街道夫子庙附近的巷子里(后称乌衣巷),此巷非同一般,车水马龙,是达官显贵出入的地方。然而好景不长,这里由盛而衰,唐代诗人刘禹锡的《金陵怀古》:“朱雀桥边野草花,乌衣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描写的就是王、谢家族败落的景象。

前边所述,到了隋朝初期,琅琊的当官的当路王氏分别迁到关中、河北和河东(今山西)等地。

始于东汉、盛于魏晋南北朝的门阀制度,衰落于唐,彻底崩溃于宋。魏晋之时显赫至极的豪门大族,各领风骚数百年后,已风光不再。

综上所述,正如族人所言,东海王与琅琊王有着扯不断的千丝万缕的联系。

### “三槐堂”号的来历

俗话说“树高分权,族大分支”。“堂号”是郡望的衍生物,它的产生比郡望晚。“三槐堂”产生于北宋初年。据传,北宋初年,琅琊王氏中,有个叫王祐的裔孙,在庭院中种植了三棵槐树,预言以后子孙必有居高位、位及公卿者,后来他的儿子王旦果真于公元1006年入相(1017年罢相),在相位12年,深为朝廷倚重。琅琊王中的这一房姓便以“三槐堂”为其堂号。

东海王与琅琊王的历史,从东周受姓至今已有2700多年,从公元前6年“筑芦小居”到现在有2200年,再从自“三槐堂”号的公元1006年或稍后,到现在也有千年的历史。

从始祖“筑芦小居”至今2200年,按著名史学

家罗季林教授推断“每代代差25至30岁为正常计算”,那么2200年应传至73代至88代之间,这与“三槐堂”东海当路王氏宗谱载传至今已80代相符的。

### “当路”地名语源分析

“当路”地名使用很早,最迟也在秦汉之前,对“当路”地名来源说法也很多,较为普遍的是民间的“邹衍说”和“张果老说”,且都因骑毛驴吃寿,被村民拦阻“挡路”而演变成“当”路。其实,这些传说牵强附会。也有学者认为“当路”源自西汉初年王尊为三槐堂东海当路王立下的祖训“当仕路,忠民权,功于国,荣于家”中的“当仕路”三字。本人不敢苟同。我认为,地名与本地的地理分布及地理特征有关,尤其是古老地名,反映当地的地理分布及其特点更为明显。地名用字还与方言有密切关系,“当路”地名便是。前不久,我曾几次去当路实地查看村落周边的自然地理状况,并从一些老人那里得知,当路村,原先只是以现在的王氏祠堂为中心,房子依山而建,逐渐向两边延伸,人家多了才形成村落。那时家家都是窗临高山,门泊大海,面对大路。现在村里路西房子是村里人家多了才有的,当初只有背山门西一排房子。

与村民的交谈,使我联想到了安徽“当涂山”的“当”字语意与“当路”的“当”字意相近或相同。我查找了有关资料,果不出所料,学者江群曾指出,“当涂山”是由动宾构词方式组成的一个动宾词组,意思就是“面对涂山”。这与我国东汉王充《论衡·变动》中“盛夏之时,当风而立;隆冬之日,向日而坐”的“当”字和北朝《木兰诗》唧唧复唧唧,木兰当户织。“阿姊闻妹来,当户理红妆。”“当窗理云鬓,对镜贴花黄”的三个“当”字语意相同,都是“面对”的意思。综上,“当路”地名,因“面对大路”而得。也就是说“当路”地名源于面对大路。这样解释,“当路”地名来源不仅符合当地历史地理环境及特点,也符合当地历史语言环境。

(作者单位:中共连云港市委宣传部)

责任编辑 邱仕明

